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新世纪接班人素质培养

军事知识素质



军事知识素质（17）

第一章 古代军事

中国古代军事之最

中国现存最早的兵书是《孙子兵法》，为春秋末期孙武所著。中国部头最大的兵书是明朝人茅元仪撰辑的《武备志》，共有 240 卷。

历史上第一部研究军制的专著是宋朝陈傅良撰辑的《历代军制》。

第一部兵书目录是汉武帝时杨仆编写的《兵录》。

我国最早的军事条令是《司马传·严位篇》，大约成书于战国初期的齐威王时代，即公元前 378~343 年。

我国最早的专门性军事著作是《令典》和《军志》，大约成书于公元前 8 世纪。

我国最早的火武器是唐代开始出现的火药火箭和火药火炮。

我国最古老的战船，早在西汉时期，已能制造不同的战船。

最早刊登军事消息的报纸是《申报》，清朝光绪 11 年，法国舰队侵入我国的宁波，上海《申报》创办人英商美查派人前往观战，并绘图，附以说明，登在申报上。最早的军官学校出现于汉代，当时称“武学”。正式的“武学”开办于神宗熙宁 5 年（1072），学制为 3 年。

最早的海军学校是 1866 年福建总督左宗棠在福建马尾创办的船政学堂。

古代军中的旗帜

古代军中旗帜很多，这些旗帜颜色各异，大小形状不同，图案、装饰繁多，各标志一定的意义。

表明身份：国王的旗帜叫“常”，上面画的是日月，表示天明。主帅在军中居于中央，用黄牙旗，为青、赤、白、黑四旗之首。

表示方位：青旗表示东方，赤旗表示南方，白旗表示西方，黑旗表示北方，黄旗表示中央。

指挥队形阵势：在战斗操练时，举青旗布直阵，举白旗布方阵，举赤旗布锐阵，举黑旗布曲阵，举黄旗布环阵。

用于指挥和开道的旗，旗杆头上缀有牦牛尾，下面有五彩折羽。

古代军乐凯歌

军队打了胜仗，奏着胜利的乐曲回来，以所获俘虏献于宗庙社稷，是古代军礼之一。而凯歌也就是军乐，亦作“恺乐”。“恺”与“凯”通。《周礼·夏官·大司马》：“若师有功，则左执律，右秉钺以先，恺乐献于社。”又云：“王师大献，则令奏凯乐。”可见这是一种蔚然可观的礼乐制度。为什么有这一套排场？战国时齐威王命大夫整理编辑的兵书《司马法》说：“得意则恺乐、凯歌示喜也。”原来是表示向皇天后土、祖宗神灵报喜，可以起到鼓舞军心、提高斗志的作用。当然也是一种“寓教于乐”的艺术宣传手段。

从春秋战国起，奏凯歌的军礼代代承袭下来。最早的“左执律”，说明有一排于执十二律吕乐器的军乐队在吹奏，列队在左边，与执黄钺的队列形

成仪仗，作为先导走在前面。它的主奏乐器是什么？有待考证。不过《晋书·乐志上》记载明白：“其有短箫之乐者，则所谓王师大捷，今军中凯歌也。”由此可知，时至晋代短箫是凯歌的主奏乐器。

大约是从宋代开始，不一定局限于在王师凯旗献俘时才奏凯歌，中间要是一个战役或者一场战斗取得胜利，士卒们是可以高唱凯歌的。既然是唱，就有了歌记词。古代只有诗人、词人、文学家，而没有专业军歌作家，所以凯歌词一般是士卒自编的，不外乎是“下里巴人”的作品，只要能表达胜利喜悦的心情就行了。北宋时，科学家、政治家沈括（1031～1095）在元丰五年（1082）前知延州（今陕西延安），西夏常来侵扰，他加强防御，时得胜仗。他发现“边兵每得胜回，则连队吭声凯歌，乃古之遗音也”。但是“凯歌词其多，皆市井鄙俚之语”。（《梦溪笔谈》卷五·乐律五）于是这位支持王安石变法、颇有改革精神的州官，一气呵成，“制数十曲，令士卒歌之”。不用说，边防军是普遍引吭歌唱了。他晚年回忆还粗略记得五篇，现全文抄录如下：

其一：先取山西十二州， 弯弓莫射云中雁，
别分子将打衙头。 归雁如今不寄书。
回看秦塞低如马，其四：旗队浑如锦绣堆，
渐见黄河直北流。 银装背 嶮 打回回。
其二：天威卷地过黄河， 先教净扫安西路，
万里羌人尽汉歌。 待向河源饮马来。
莫堰横山倒流水，其五：灵威西凉不用围，
从教西去作恩波。 蕃家总持纳王师。
其三：马尾胡琴随汉车， 城中半是关西种，
曲声犹自怨单于。 犹有当时轧吃儿。

每篇都是四句，七言句式，音节二二三，分明采用了方言俚语，朴素，顺口，使歌词增色。具有七言近体诗和民歌浑然一体的格调。体味歌词的主旨，反映了作者热爱祖国大好河山，收复失地，团结西北方少数民族，和睦共处的思想。从现有史料看，这五篇是今存唯一的一组凯歌词。沈括是历史上可知的第一个凯歌词作者。南宋刘克庄《破阵曲》：“六军张凯声如雷。”明代于谦《纪梦中作》诗：“来年二三月，吟听凯歌还。”凯歌历代皆有，而老资格的完整凯歌词，只有沈括这五篇了。它是可以作为研究北宋与西夏关系史料来看待的。

阅兵史话

阅兵是古今中外一种隆重的军事仪式，通常在国家重大节日和大型军事演习时进行。阅兵仪式起源很早，公元前，古埃及、波斯、罗马等国，便已有阅兵的活动。我国春秋时期亦有“观兵以威诸侯”的记载。如齐桓公6年8月，曾举行“大阅”。近年挖掘出来的秦陵兵马俑，就是很古代阅兵的阵式。18世纪以后，在西欧等国广泛普及阅兵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盟军统帅如斯大林、艾森豪威尔、丘吉尔、戴高乐等，都很重视阅兵，经常举行各种盛大的阅兵活动。

现代的阅兵，受阅部队多，礼仪时间较长。一般分为阅兵式和分列式。阅兵式是指首长或贵宾在阅兵指挥员的陪同下，乘车、骑马或步行从受阅部

队队列前通过，进行检阅；分列式是指受阅部队列队从检阅台前通过，接受首长的检阅。受阅时，受阅的地面部队编组成若干徒步或机械化方队，以护旗方队为前导行进，并配置有司礼部队，军乐团（队）等。阅兵进行时，受阅的空中飞行梯队也依次飞过检阅台上空。

我国在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和 1984 年 10 月 1 日 35 周年的国庆大典时，都曾在首都天安门广场举行规模盛大的阅兵仪式。

历史上最早的正规军校

宋代武学，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正规军校。庆历 3 年（1043）5 月，为了改变军事人才缺乏的局面，初设武学，但在某些臣僚的反对下数月即废。宋神宗继位后，任用王安石变法，熙宁五年（1072），复置武学于武成王庙，从此开始了我国正规军校教育的培训体制。宋代武学有比较合理的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其内容包括：军事理论、军事历史、军事学术和政治思想教育。同时，还设有实兵演习课。《孙子》、《吴子》等七部兵书，作为武学的经书和教范。

武学学员的来源是未授职的使臣（八、九品武官）、荫补的官将子弟。有一定军事知识和技术的平民百姓，经地方官推荐报考，成绩合格者才能取得入学资格。

武学学制 3 年，分为上舍、内舍、外舍三级培训体制。如果武艺、策略等各科考试成绩多次居于下等，则逐步降级，直至最后开除学籍。

学员毕业考试合格后，按成绩好坏和资历深浅实授官职。才能特别出众的上舍生，由枢密院严格审查，情况属实者准许提前毕业，并立即录用为军官。同时规定，所有学员必须分配到边远地区任职一段时间，如果在职 3 年无差错，依例升迁。

宋王朝规定武学由兵部主管，“选文武官知兵者为教授”，设“博士”“学谕”具体负责教务。宋代武学的基本传统和经验，对于后世军校建设和军事人才培养，一直产生着积极影响。

兵符谈源

符牌中的重要角色，莫过于古代的兵符。兵符的佼佼者，则莫过于虎符。信陵君窃符救赵，是有关虎符的最早的故事。考古发现的秦杜虎符，是今日所见的最古老的虎符，已有 2300 多年了。

虎符在汉代，铭文始铭于虎脊，符分字也分。它是今日凭信物普遍在骑缝处盖章、编号的祖型。

虎符到宋代，改成牌状。辽金元也加以模仿。元虎符。牌顶饰一虎头，俗称“虎头牌”。从此，凭信物的雅称“符”，逐渐让位于俗称“牌”。今日称“牌”，而不再称符了。

牌源于符，符源于节。古代节的质料、形制、用途很多。诸如玉节、角节、虎节、龙节，或调兵，或用之外交，然而最古老的是竹节。考古发现的鄂君启节，形若带节竹板，却是用青铜铸成。有趣的事，其节共有五枚，合起来恰是一个带节的竹筒。它生动地揭示，断竹为节，剖节为符，这就是符节的发展史。

剖物为信的风俗，可以追溯到古老的原始社会。符牌文化可考的历史至少已有 3000 年。

烽火报警何时止

有文记载说：“宋末元初，烽火报警已变成历史遗迹，其实此说不确。据《明史·兵志》记载：“（洪武）9 年……分兵守古北口、居庸关、喜峰口、松亭关粮堆百 96 处……建文元年，自宣府迤西迄山西缘边皆峻垣深壕、烽堠相接……各处烟墩，务增筑高厚，上贮 5 月粮及柴薪药弩。”可见，做报警用的烽火台在明初仍是北部边疆的重要军事设施，用以防备蒙古入侵，这种烽火台很多与长城连为一体，同时也有一些仍是单体建筑。这种单体的烽火台，在我国沿海一带设置尤多。自元末始，倭寇屡为海患，明初在沿海烟墩，在清初顺治年间裁撤所卫时，多已废圮，但北部陆路边疆，则依然使用烟墩报警。清初于各省边境扼要处，设立墩台营房，有警则守兵举烟为号。“寇至百人者，挂一席，鸣一炮；至三百人者，挂二席，鸣二炮……”（《清史稿·兵志》）此时的烽火台已不单单是烟火报警，而又加之挂席、鸣炮，这是烽火台的改进。“咸、同朝……边堠尽废……左宗棠平定新疆……其常设卡伦，严申旧制，边烽少息矣。”（《清史稿·兵志》）可知直至清代后期，北边仍用烽堠。举烽播燧，这种历史悠久的报敬方法，虽然因时代不同而有所变化，却几乎与我国旧式军制相始终。

宋代军用密码

北宋时代我国出现了第一本真正的军用通信密码表。它保存在曾公亮编纂的《武经总要》中，曾公亮指出了以往常规规定事通讯的严重缺点，想出了一种高明的办法：先收罗当时军中必用的 40 个短语，给它们分别编上相应的代码数字。例如：1. 清刀；2. 请简明；……14. 请添兵；……18. 请固守；……当大将率兵出征时，先发给他一个密码本，并和兵部事先约定好，利用某一首五言诗，作为解码密钥。例如，约定下面这首诗作为解码之用：“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惟闻钟磬音。”战斗进行后，统兵将领请求固守阵地。这时，他查出“请固守”是第十八号密语，而诗中的第十八个字是“花”字，于是，马上编发一道嵌有“花”字的普通公文，并在“花”字上加盖印章，以表示此字是个关键。公文到达后，主帅马上就可以破译出来。如果他同意下属的请示，就重新写下这个字，把它夹杂在文章中，加盖印章发回；如不同意，凡什么也不写，只盖上一个空印。这种通信保密方法，不仅敌人看不懂，就连送信人与偏裨将领也不知道。

武圣人的称号应属孙武

中国古代尊奉的文武圣人，文圣人孔子，已有定论。武圣人有两位，一是蜀汉名将关羽，一是民族英雄岳飞。“圣人”是中国古代社会人们对一个人的最高品种评价。关、岳两人，各领风骚千百年。中国历代名将中，其业绩、品格和关羽、岳飞不相上下的还有不少，关羽、岳飞都有各自的不足之

处。从古代军事科学领域推出杰出代表人物，以品格、理论造诣及对后世的深远影响而论，数千年来孙武一人而已。武圣人的称号，只有孙武当之无愧。

《孙子》精髓何在

《孙子》精髓是什么？回答有四：1. “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孙子》精髓。日本学者与美国军事家对此认同，认为《孙子》这一观点触及了现代核战争的实质，是最理想的战略，很有现代色彩，它也是古今战术决策的最佳选择。2. 争取战争的主动是军队的命脉所在，所以也是《孙子》精髓。3. 《孙子》精髓是“避实击虚”或《孙子》书中提供的军事哲学即朴素的辩证法思想。4. 提出《谋攻》篇是十三篇的核心，它应是《孙子》精髓。战争的目的就是进攻——取胜，“不战而胜”、“避实就虚”、争取主动全在于“谋”，辩证法只是“谋”的方法。故“谋攻”是事关全局的精髓

《孙子兵法》走向世界

一提起我国古代的兵书《孙子兵法》，谁个不知、哪个不晓？即使不是军事家，对其中“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一类的话，都耳熟能详。书中有许多军事方面的韬略伟论，有许多战略战术方面的神机妙算，有许多关于战争规律的透辟阐述，久已成为军事学上的宝典。到了现代，很多人还发现书中有不少经营管理之道，譬如有关时间、效益的观念，有关经营战略、经营决策、市场竞争、组织原则、选才用才之道等等，几乎在“孙子”书中都可以找到精辟的见解，因此，日本、欧美等国家的经济专家、学者，都对“孙子”非常重视，他们把某些思想运用于现代经营管理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所以企业家们人人争读《孙子兵法》，掀起了一片研究、学习的热潮。

《孙子兵法》早在1200年前传入日本，由当时作为遣唐副使与留学生的吉备真备传入。日本人视之为“兵之要枢”，日本著名古代兵书如《甲阳军鉴》、《信玄全集》、《兵法记》和《兵法秘传》等，其主要思想，都源自《孙子兵法》。在近代史上，20世纪初日俄战争中，日海军于对马海峡全歼俄国波罗的海舰队，就是日本海军总司令东乡平八郎运用《孙子兵法》中“以逸待劳”的原则作为指导思想而取得胜利的显例。至今，日本著名的研究者已达170多人，出版研究专著200多种。

在西方，《孙子兵法》是在18世纪由法国传教士阿摩译成法文，于1782年在巴黎出版。当年横扫欧洲大陆的拿破仑就读过《孙子兵法》。1900年，英国人卡罗普译成英文，在伦敦出版。1910年，英国汉字家翟理斯重译并加注释出版。自此而后，俄、意、德、捷等国都有本国语言的译文和大量的研究著述。二次大战后，苏联出版了西多连柯的《孙子兵法》新译文，东德国防部据此转译为德文本，并规定为军事院校的教材。英国蒙哥马利元帅，也号召当今各国的军事院校，都应把《孙子兵法》作为必修课程，列为将校必读之书。

在现今世界上，各国讲求“商战”，论企业经营管理的书籍上千成万，而从根本道理上说，多数抵不上一部《孙子兵法》，例如书中讲到出奇制胜之道。所谓奇，就是一般人没有想到而你首先想到。今天成功的商人无不应用“人无我有，人有我创，人赶我转”的方针，这正是孙子当年用兵“出奇

制胜”的策略。

《孙子兵法》的思想是恢宏的，它是兵书，也是哲学，又是政治、经济、外交诸学的结合。世界许多著名的战略管理学家和大企业家，他们的理论和商业成功都借鉴了《孙子兵法》的战略思想。

奇门遁甲术

奇门遁甲术是中国古代传下的三大秘术之一，即“奇门”、“六壬”、“太乙”，有“精通三式，乃为神”之说。实质上这是一种与易经八卦学相似的古典运筹预测方法。十个天干，把“甲”干隐（遁）去，用九干来演算，这是“遁甲”名称的由来。而九干中，分为“六仪”与“三奇”。八方位分为八门，如果“三奇”遇到八门中的吉门，就得了“奇门”。“奇门遁甲”之称便由此而来。古人利用奇门遁甲术进行运筹推算，掌握未来行事的方位时辰等有关因素组合，定局排盘，择吉避凶。它涉及到易经、阴阳五行生克制化、干支交互变化等古代术理，被古人当作一门夺天造化的学问。

关于奇门遁甲术产生的传说亦颇为神奇，古书记载：黄帝蚩尤在涿鹿大战，相持不下。一日黄帝梦见九天玄女下降，传授黄帝“奇门遁甲术”。黄帝依靠此术打败了蚩尤，并传于后代，相传，周朝姜太公用奇门败纣王；楚汉相争时黄石公传授此术于张良，扶良高祖得天下；三国时代，诸葛孔明更妙用奇门遁甲，布八阵图，助刘备三分天下。在古代，因此术为军师辅佐君王行兵作战之术，关系社稷安危，兴邦治乱，故号称帝王之学，多秘而不宣。经过久远年代的传抄口授，以讹传讹，衍生出许多流派。至今虽为失传，仍散见于民间，却也是各行其道、难定一尊了。这门古术的科学成分尚待研究，而它与易经同为华夏文化遗产当是无疑的。

三十六计诗

三十六计，是我国宝贵的古代军事文化遗产。古往今来的军事家，无不以记、通三十六计为基本功。古时，有位学子为便于记忆，选取三十六计每计一字，依序吟成一首诗：“金玉檀公策，借以擒劫贼。鱼蛇海间笑，羊虎桃桑隔。树暗走痴故，釜空苦远客。屋梁有美尸，周魏连伐虢。”

这首诗，除“檀公策”三字说明系檀公辑（不确——编者），其余每字（末句为两字）都指出三十六计中之一计。依序读之，分别是：金蝉脱壳；抛砖引玉；借刀杀人；以逸待劳；擒贼擒王；趁火打劫；关门捉贼；浑水摸鱼；打草惊蛇；瞒天过海；反间计；笑里藏刀；顺手牵羊；调虎离山；李代桃僵；指桑骂槐；隔岸观火；树上开花；暗渡陈仓；走为上；假痴不假；欲擒故纵；釜底抽薪；空城计；苦肉计；远交近攻；反客为主；上屋抽梯；偷梁换柱；无中生有；美人计；借尸还魂；声东击西；围魏救赵；连环计；假途伐虢。

历史上的美人计

1. “美人计”解 “美人计”在古《三十六计》中列第三十一计，即“败战计”第一。《三十六计》解释其策曰：“兵强者，攻其将；将智者，伐其

情。将弱兵颓，其势自萎。利用御寇，顺相保也。”白话可解释为：“对兵力强大的敌人，要利用各种手段去制服他的将帅；对足智多谋的将帅，设法用美女淫声去迷惑他的战斗意志。将帅的斗志衰退，军卒的士气消沉，部队就失去了战斗力。利用敌人的弱点进行分化瓦解工作，我方便可以顺势保存实力。”据此可知，这里的“美人”二字，“美”是动词，“人”指敌方；“美人计”的含义，系指利用物质诱惑而蒙蔽敌方，使敌方贪图安逸享受，斗志衰退，内部分崩离析，再从而谋攻的策略。可能因为美人计的实施常需借助美女的缘故，因而现在一般将此计理解为利用美色达到某种目的的谋略，这里的“美人”二字，已直接是指“美女”了。

2. “美人计”实质 《三十六计》将美人计列入败战计，意味着实施这一计策需付出一定的代价。这一代价便是美人的代价，确切说，是女人的代价。运用美人计进行政治、军事、经济斗争的事件，古今中外皆有，并非某个国家或朝代的特产。美人计故事兼备传奇色彩和言情特点，在这类文艺作品中，那些被送去充当政治工具的的美女，有的被塑造成忧国忧民的巾帼英雄，为了拯救国家和诛杀昏君奸贼，毅然以自己的肉体作为进攻的软武器，来达到复国或除暴的目的——我国古典文学作品中的西施和貂蝉，可算是这类美人的典型；有的则被描写成误国乱朝的祸水——如夏之妹喜、商之妲己、周之褒姒，后世谏臣但论女人误国，必举为佐证。

历史上某一朝代、某一君王的覆亡，自有其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原因。英雄尚不能主宰历史，美人如何有此能耐？如果一定在将亡国灭种的责任归咎于某位个人的话，那也首先应归于沉湎女色、骄侈暴淫的亡国之君。妇女在美人计中所扮演的角色，实质不过是政治斗争的工具。在绝大多数美人计中，女人都不过充当了男子泄欲工具的色度，处于被侮辱的低贱地位。去褒扬这些美女的“义举”或谴责其为误国的“祸水”，不如为她们的悲剧命运而嗟叹。将美人计中的“美人”描写成忧国忧民的巾帼英雄，实际是肯定妇女以肉体充当政治斗争工具行为的合理性，从而是对妇女形象的一种精神污辱人格贬低。

3. 历代美人计的流传 我国历代美人计的流传，大抵是借助于三种途径，一是正史，二是野史，三是各类文学作品和民间轶闻传说。

正史可能因为有许多避讳的缘故，所载美人计故事真凤毛麟角。只有《史记》是个例外。历史上较著名的美人计故事，如骊戎以女乱晋；荀息定计灭虢、虞二国；秦穆公用女乐计赚由余；黎向鲁国献美女宝马，从而驱逐孔子；张仪巧用美人计，几番愚弄楚怀王；吕不韦移花接木，使异人还归咸阳，拜他为相；匈奴冒顿单于以良马爱妻迷惑麻痹胡王，最后一举破灭东胡；等等，《史记》都作了颇为生动详细的记载。

野史系私家所撰，对史料的取舍较为自由，由此便可以记录和保存许多正史不载的内容。像《左传》、《国语》、《吴越春秋》等史书，历来治史者多当正史来读。一些正史不载的美人计故事，幸赖得以保存。如郑武公嫁女屠臣蒙蔽胡国，后轻易图之；蔡侯献舞痛恨息侯出卖自己，于楚宴上诱引楚文王，使其劫扭亏为持灭亡息图；越王勾践采文种灭吴九术，几番运用美人计，从而起死回生，最终灭掉吴国；等等，今人多不怀疑这些情节的真实性。

文学作品（主要是历史小说）综采正史、野史轶闻和民间传说，也记录和保存了不少美人计故事。罗贯中在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中重笔描写了两

段美人计故事，即王允献婢除董卓和孙权进妹赚刘备。貂蝉这个人物各类史书均不见载。她的命运是与王允、董卓、吕布联系在一起的，王允使布杀卓，见于史籍记载。问题的焦点是王允使布杀卓，是否借助了貂蝉为诱饵。研究《三国演义》的学者肯定说，罗贯中在撰著《三国演义》时所阅读参考的资料，有些已经失传，因此很难断定《三国演义》中某个未见史载的人物或情节属于虚构。譬如该书第九十六回写了个大将张普，《三国志》、裴松之注及其他史书均不见载。后清末光绪年间发掘出强普先君及先兄墓，才知张普并非虚构人物。目前尚未发掘出可以证明确有貂蝉其人的出土文物，但仔细研读《后汉书》和《三国志》中有关王允、吕布、董卓的伟记，仍能发现不少蛛丝马迹。据《后汉书·吕布传》载云：“卓以布为骑都尉，誓为父子，甚爱信之。稍迁至中郎将，封都亭侯。卓自知凶恣，每怀猜畏，行止常以布自卫。尝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掷之，布拳捷得免。而改容顾谢，卓意亦解。布由是阴怨于卓。卓又使布守中阁，而私于侍婢情通，益不自安。因往见司徒王允，自陈卓几见杀之状。时允与尚书仆射士孙瑞密谋诛卓，因以告布，使为内应。”分析这段文字：卓与布誓为父子，又对布“甚爱信之”，如何因小小失意至暴怒到拔吕布手朝掷之？布与卓侍婢私通，这一“侍婢”若非王允所献，如何吕布转而便将此羞于启齿之事禀告王允？作为正史，《后汉书》、《三国志》割舍貂蝉这一角色和删略王允行用美人计的细节能似可理解。后世人们将貂蝉列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可见貂蝉的形象已为一般群众所接受。

孙权进妹赚刘备，“赔了夫人又折兵”的故事，基本情节倒是本于《三国志》。不过罗贯中在讲授这一历史故事时，也虚构了不少情节。如小说中促成刘备招亲的关键人物吴国太和乔国老，在建安十四年早已不在人世；再如“佛寺看新郎”的佛寺即甘露寺，当时也并不存在；小说对孙权之妹在这桩政治婚姻中的态度描写也不真实，嫁与年近半百的刘备，而且是嫁到名为盟友实则勾心斗角的去处，这种政治婚姻，对她来说是悲剧而绝非喜剧。

古代的军事间谍

使用间谍是战争中的一种重要手段。我国最早使用间谍的，据《左传》载，是夏帝少康。不少古代的名士贤臣都亲自做过间谍，如商代的伊尹、周初的姜子牙、孔子的高足子贡等。

姜子牙《太公六韬》论间谍的职能曰：“游士八人，主伺奸侯变，开阖人情，观敌之意，以为间谍。”

间谍的称呼，五花八门。《周礼》谓之“邦沬”，即斟酌盗取机密之意；《尔雅》称之为“佯”，反间之义；《左传》称“谍”，《礼记》“覘”，《鹖冠子》称“怪”；《史记》称“中龄”；《后汉书》称“侦侯”；《左徒注》中叫“游侦”、“细作”。

《孙子》对使用间谍的方法作了精辟的论述：“用间有五：有乡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五间俱起，莫知其道，是为神纪。”乡间，即利用同乡关系去从事间谍活动；内间，是利用敌人内部派别人间的矛盾进行间谍活动；反间，就是利用敌人的间谍为自己服务，或收买、或泄亿情报使敌人上当；死间，即用犯罪的人做间谍，必要时可以牺牲间谍来达到我方目的；生间，即选择精干的人做间谍，搞了间谍活动之后，能活着回来报告

情况。五间的关系互相关联、互相补充，而以反间为根本，为关键。

唐代军事家李靖对使用间谍的方法，也有类似《孙子》“五间”的阐述，即“因邑人”、“因任子”，“因敌使”，“择贤能”，“缓罪戾”，还分为“间亲”、“间能”、“间助”、“间邻”、“间左右”等方法。

古代战争方式考

在我国古籍中，经常出现一些描述战争性质与战争方式的词，如“击”、“袭”、“侵”、“伐”、“征”、“战”、“攻”等等。其中，除了“击”、“攻”、“战”三个词表示一般地攻打、作战外，其余的词在描述战争性质和战争方式上均具有特定的含义。

“征”，是指上伐下。有道伐无道，是所谓的“褒义”词。如《左传·僖公四年》：“五侯九伯，汝实征之。”这是指上伐下。

《孟子·梁惠王上》：“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这是指有道伐无道。

“伐”，用于诸侯国之间，不仅限于上对下、有道对无道的进攻。其特点是出兵的一方须事先找个理由，即“师出有名”。

因此是中性词，后因“征伐”、“讨伐”连用，而渐具褒义。如《左传·隐公元年》：“命子封率车二百乘以伐京。”

古人使用这组词是很讲究的。《左传·庄公二十九年》中说：“凡师有钟鼓曰伐，无曰侵，轻曰袭。”实际上，“伐”指正式战争，有钟鼓，表明行动公开，而且进攻“袭”比“侵”更富有秘密性质，只是偷偷地进攻。

除上述方式之外，还有“围”，即众兵包围；“邀”，即拉击；“逆战”，即迎击。

古代烟幕战

烟幕在战争中起着重大作用，它能迷惑敌方，保护自己免受攻击。我国古代很早就懂得烟幕的作用，远古传说“蚩尤能作大雾，军士昏迷”，这里的大雾即是人工烟幕，史籍中最早记载烟幕用于战斗，则是在公元589年。当时，隋朝大将贺若弼奉命伐陈，当挺进到陈都城建康效时，和陈将鲁广达所率陈军发生遭遇战，隋军败退数次，死者无数，形势十分危急，这时贺若弼灵机一动“纵烟以自隐”，迷惑陈军。陈军以为隋军已败，即持隋军士兵人头向陈后主请赏，因而阵势大乱，隋军趁势反攻，转败为胜，最终生俘陈后主。这次战斗，隋军取胜的主要原因是使用了烟幕，较好地隐蔽了自己，给陈军造成了失败的假象，然后出奇制胜。

动物助战拾粹

以牛助战 战国中期，燕国在秦、赵、魏、韩等国的帮助下大举进攻东方的齐国。田单征集了1000多头牛，给每头牛的牛解上绑上尖刀，给牛身上披上彩衣，再用麻布浸了油膏，绑在牛尾巴上。齐兵也画脸涂眉，装扮成巫师的模样。齐兵乘着天黑，悄悄打开城门，点燃牛尾巴上。牛受灼热，疼痛难忍，向前狂奔，齐兵紧随其后，城中妇女老幼都上城击鼓鸣金，呐喊助威。

燕兵原以为齐军就要投降，放松警惕，突然遭到进攻，惊慌失措。火牛带着尖刀直冲燕兵大营，触及者非死即伤，燕兵见齐兵陈势以龟神降临，吓得四处敌逃。田单带兵猛攻，燕兵大败，连主将也被杀。

以马助战 东汉灵帝时期，杨璇为零陵太守。当地盗贼势力很大，四处攻掠。当时杨璇的军队很少，士兵不敢与盗贼开战。杨璇却命人特制马车数十乘，用布沾油系于马尾；另外又用鼓风皮囊装上石灰。然后，杨璇与盗贼开战。杨璇首先战据顺风的一面，命人鼓动皮囊，吹扬石灰，一时间敌陈白灰弥漫；随后，士兵点燃油布，马受火烧，惊疼狂奔，直冲向前。马车把盗贼军队冲得大乱。杨璇带军队紧随其后，大破盗贼。从此境内安宁。东汉末年，曹操与袁绍为争夺中原展开大战。袁绍命大将文丑进攻曹操，曹操见文丑军队兵甲整齐，就不与硬拚，而带军队后撤。撤至一高坡处，曹操命人将战马马鞍、辔头都御下，置之坡下；另外埋伏一队精兵。文丑的军队追及坡下，见马甚多，都四处纷纷追捕，队伍大敌。曹操此时立刻挥军掩杀，斩杀文丑，大败袁军。

以象助战 春秋末年，吴楚两国经常交战。有一次，楚昭王带兵与吴兵作战。由于吴兵势大，楚兵渐渐不支，正在关键时刻，楚令尹固带大象加入战斗。固命人用布浸油系于象尾，点燃油布，大象受疼向前奔驰，踏践吴军、吴军大乱。固带军队反攻，救出了楚昭王，反攻为胜。

明朝末年，由于清兵入关，起义军多与南阳军队联合，共同抗击精兵。原张献忠的部将李定国转战南方各省，屡败清兵。李定国军中有一半人是彝、瑶、傣等少数民族，他们善于调驯大象，使之进可践踏敌阵，退可为垒防守，刀箭皆不得伤其要害。李定国与清定南王孔有德在榕江开战。李定国列象阵冲击清军，清军战马听见象鸣惊恐乱奔，冲乱了自己的阵营，李定国率兵攻击，清军大败，孔有德仅以身免，逃入桂林，李定国进围桂林，孔有德势穷自杀。其后，李定国又用同样的办法大败清谨亲王尼堪于衡阳，阵中斩杀尼堪。李定国“两蹶名王，天下震动”。

清康熙年间，吴三桂据云南叛乱。不久，吴三桂死，孙子吴世璠继位。吴世璠也命人于云南森林驯练大象，让其参加战斗，屡败清兵。后清将蔡毓荣施计，用火攻象阵，大象遭到火攻皆惊慌慌乱，掉头反奔，冲入自己营阵。清兵乘势进攻，大败吴世璠。

以骆驼助战 清康熙年间，准噶尔部可汁噶尔丹发动叛乱，发兵进攻北蒙古三部，兵锋直逼京畿，京城震动。康熙亲自统兵西征，两年遇于距北京700里的乌兰布通。噶尔丹用万匹骆驼组成方阵，形似方城，给骆驼背上放上木箱，外蒙以湿毡，抗拒清兵进攻。清兵连攻驼阵，皆不得手，损失不小。清兵遂改变战术，用火炮轰击驼阵中部，将其截为两段，然后分头攻击。结果敌阵大乱，清兵乘机猛攻，叛军大败。噶尔丹只得带少数人逃走。

以鸡助战 东晋时期，东晋将军殷浩率军北伐前燕。兵于洛阳，突然属将羌族将领姚襄率众反叛，进攻殷浩，殷浩令长史江潘迎敌。江潘对部属说：“敌众我寡，且其营栅又坚固，不可强攻，当以计破之。”命人抓鸡数百，以麻布浸油系于鸡足。然后，江潘带人潜伏至姚襄大营前，点燃油布，扔进大营，群鸡遇火惊飞乱扑，姚襄大营四处起火，烈火蔓延，兵士大乱。江潘带兵掩杀，打败了姚襄。

以猴助战 北宋政和年间，赵绶为梓州路（今四川中南部）转运司判官。思州（今贵州务川）夷人酋长卜漏叛乱，四出攻掠，危害很大，赵绶率军平

叛，卜漏率众退入轮缚山据守。轮缚山山高林密，地形险要。卜漏在山上垒石为城，在城外挖陷阱、设木栅，防守森严。宋兵数次进攻，都遭失败。部将种友植、田祐恭建议率一军从山后悬崖爬上，从前后攻击，使其腹背受敌。赵绾很赞同。命人上山抓来猴数十只，用麻布作成火炬，浸沾油膏，缚系于猴背上。种、田二将率勇士及猴利用夜晚从后山依靠绳索爬上山顶。鸡鸣时分，种、田二将命发火燃炬，猴热狂跳，四处乱窜。叛军的住舍都是用茅竹所筑，遇火即燃，叛军大乱，号呼奔逃，种、田二将率勇士呐喊攻击。猴受呐喊益惊窜，火势益烈。赵绾见山上火起，率军大举攻击。叛军前后受敌，四处溃逃，坠崖者不计其数。卜漏只身逃走，后被擒，叛乱遂平。

以虎豹助战 春秋时期，晋文公与楚国战于城濮。晋将胥臣统率一军，他在开战之前，将战马的身上披上虎皮。一交战，楚军战马见到此景，以为是真的老虎，吓得嘶鸣后奔，冲乱了大阵，胥臣乘机掩杀。最后，晋军获得大胜。新莽时期，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关东（函谷关以东）地区到处爆发农民起义。王莽命王邑、王寻带 40 万大军东出镇压，王邑、王寻为了助威，还征集了许多老虎、豹子。王邑大军进围昆阳，起义军在昆阳坚决抗击，并且各地的起义军都赶来援助。这时，大风突起，飞沙走石；电闪雷鸣，大雨交加，那些老虎、豹子都惊恐万状，四处乱窜，把王邑的军队冲的乱七八糟。起义军乘势进攻，大败王邑军队，并杀死王寻，加速之王莽政权的垮台。

用音乐打仗的趣闻

公元前 202 年，刘邦率兵把楚霸王项羽和他的 3000 名士兵围困于垓下（今安徽省灵璧县南）。刘邦吩咐汉军士兵，每到夜深人静之时，就高唱楚国民歌。项羽的子弟兵听到自己十分熟悉的乡音，触发起思念家乡的感情，于是军心懈散，不战而溃，这就是“四面楚歌”这一典故的由来。

《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巧摆空城计的故事，音乐也起了重要作用。当时司马懿率领 15 万大军分两路前来攻城。诸葛亮身边无大将，只有几员文官和 2500 名军士，他为了稳定军心，从容登城，操弦弹奏，表现出潇洒闲逸、镇定自若的神态，周围的士兵听着那铿锵有力的音乐旋律，看看主帅那悠闲自得的操琴风度，紧张的心情立即松弛下来。司马懿细辨乐声，声声慢，慢如飞鸿，步步轻，轻似落叶，一点没有紧张慌乱迹象，于是疑其有诈，迅速撤退。

东晋末年大将军刘琨，在并州当刺中之时，有一次匈奴乘虚而入，将晋阳城包围得如同紧箍。刘琨组成一个专门吹奏胡笳的乐队，上城吹奏。在辽阔的原野上，飘拂着浑厚圆润的胡笳乐，这音乐撕扯着匈奴将士的心，激发起强烈的思乡情绪，因而匈奴内部纠纷迭起，不愿恋战，要求北归。最后不战而退。

南北朝时，北魏大将崔延伯，聘用艺人田僧超在部队专门吹奏音乐。作战时，崔延伯让田僧超吹起慷慨激昂的《斗士歌》，激发将士英勇杀敌，经常打胜仗。后来，敌方知道这一内情，便重金招募箭手将田僧超射死。东魏权臣高欢，在一次对北魏军作战中，因伤亡大，军中士气低落。高欢便让一位敕勒族部将斛律金唱《敕勒歌》，唤起了敕勒族士兵对家乡的热爱，激发了团体一心的战斗意志。

草船借箭实为孙权

从史书资料中得知：三国时真正用船借箭的并非诸葛亮，而是吴主孙权。

据史料记载，当年借箭确有其事，但时间是在赤壁之战后的建安十八年（213）其主人是吴主孙权，乘坐的船是战舰而非草船。《三国志·吴书》载：“十八年正月，曹公攻濡须，权与相拒月余，曹公望权军，叹其齐肃，乃退。”《魏略》载：“权乘大舰来观军，公（曹操）使弩乱发，箭著其船，船偏重将复，权因回船，复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还。”

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时，经过艺术加工，把“草船借箭”的功劳记在诸葛亮的帐上，使这一讹传流传至今。

“七擒孟获”恐非史实

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在不少严肃的历史著作和中学教科书中都是当作历史事实来叙述的。过去曾有人对此事的真实性表示怀疑，近来又有不少史学家提出“七擒孟获”情节过于离奇，可能只是民间传说，并非史实。

提出怀疑的主要理由是：“七擒”之事在《三国志》中并无记载，是到了东晋以后才出现的故事，后者记述又有层层添加的痕迹，距三国时代较近的史学家陈寿，在写《三国志》时，曾两处提到建兴三年（225）春诸葛亮率军南征的事，但他只字未提“七擒孟获”。最早记载“七擒”之事的是南北朝时的史学家裴松之，他是转引东晋时人写的一本《汉晋春秋》的。东晋时人写的《华阳国志》也记有“七擒”之事，但民间传说故事的色彩很浓。比如其中谈到孟获为煽动南人造反，曾造谣说官家要征收胸前都是黑毛的狗300条，要一种小虫子的脑3斗……这都很像是民间传说。后来史籍记叙此事又层层添加。“七擒孟获”最后人为了歌颂诸葛亮而编造出来的。其实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还流传过“七擒诸葛亮”的故事，这些都不能当作史实来看待。

诸葛亮南征时曾采取了“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策略，孟获也是有其人的，诸葛亮曾经俘孟获，不杀，是有可能的，而“七擒七纵”则不可信，这只是后人对诸葛亮的一种“神化”罢了。

哪些是兵家必争之地

兵家必争之地，有河东根本之地太原，有辽东喉舌大连，有三齐要都济南，有中原逐鹿的郑州，有四方要塞洛阳，有陕南形胜之地汉中，还有长江三矶之首的采石矶，铁马秋风的大散关，等等。古代大军事家孙子曾说：“夫地形者，兵之助也。”历史上以弱胜强的楚汉成皋之战、吴魏赤壁之战、秦晋淝水之战，毕以占据有利地形而出奇制胜。所谓兵家必争之地，有三个方面，一是历史名城，如长安、洛阳、南京、北京；二是山水险阻，关隘要津，如太行山、陇山、龙门、剑门关，山海关；三是交通枢纽，如兰州、郑州、井泾关、潼关。如攻占川鄂，先取宜昌，如淮西有事，必争合肥。唐明皇兵退马嵬坡，首先是洛阳门户失守，接着又被安史叛军越过潼关天险，关中自然难保了。

以睢阳为例，睢阳，今名商丘，在河南省东部，北城地理位置极为重要，

是南粮北运的要塞。早在春秋年间，齐宋联军进攻宋国，宋亡国后，其残余势力凭借睢阳，与诸侯相持达数百年。三国年间，曹操兵驻谯县，先攻占睢阳，解决军粮运送问题。睢阳在“安史之乱”中为江南之屏障，江淮之喉舌，是兵家必争之地。公元1129年，宋高宗南逃至商兵，也在此建立南宋政权，后移居健康。

中国有出京剧《战徐州》，徐州是古战场之一，也是南京的北大门，徐州一失，南京就危在旦夕。故而，兵家十分重视地形之优势，两军对垒，谁先占得有利地形，便操了一半胜券。孔明一失街亭，只能唱“空城计”了，便是这个缘故

古代的弓

弓是中国古代较为普及的一种兵器，它的发明是人们生产劳动的一大飞跃。在这以前，原始人只能用棍或石猎或石猎击目标，弩弓问世，这种猎击的力度和准确率都大大提高，使人们的食物富裕起来了。

最早的弓简陋粗糙，一根树枝或一根竹子一弯就是弓体。用藤或兽筋作弦，人称半月弓；后改为返曲形，弓体中间呈凹形，能储备更多的弯度，增加发射力。春秋时楚王就有一把大典刀，它与鲁连子的琢之璧皆为国宝。连年战争，作为杀伤武品的弓也就是日趋繁多，美观精致的有画弓、凤凰弓、绿沈弓、绣弓等，令敌胆战心惊的有九石弓、神臂弓、五百步弓、铁胎弓、紫檀弓、戎弓等。皇帝用的弓叫“雕弓”，弓体上刻有花饰图案，材质也坚硬，能射五百步之远。《后汉书》记载：当时鲜卑人用牛的角为弓，光亮华丽，弹性很足，具有强大的杀伤力。《尔雅》中还有珣弓和金蚌弓，弓角两头都饰有别致的美玉。不失为一种艺术品，还有蛇弓、燕弓、桑弓、桦皮弓、彤弓等。

由于弓是常规武器，唐宋时选武将规定要考弓法。随着练弓运动的普及推广，逐渐出现了弓衣、弓鞋、弓帽、弓套等，全套服装穿带上，挽弓放射，雄姿英发，潇洒健美。《六一诗话》说苏东坡就曾在海南鸟猎人那里觅得一件弓衣，甚为珍之，专门写了诗颂称它。弓的上品。《宋朝事实类苑》记有六个标准：一是材质轻巧而有功，二是挽拉和顺而有力，三是经久耐用不变形，四是冬夏力度相一致，五是弦声清脆又响亮，六是富有弹性。

响箭：鸣镝

我国古代有一种专门用于指挥战争的特殊武器，叫“鸣镝”。鸣为响声，镝为箭头，鸣镝就是响箭，它射出时箭头能发出响声。秦末汉初，匈奴族出了一个著名首领冒顿单于，鸣镝正是他发明的。冒顿本是头曼单于的太子，后来头曼的妾生下一子，很受宠爱，头曼想废冒顿而立少子，乃将冒顿送到月氏国作人质，并发兵急攻月氏，欲置冒顿于死地。月氏王要杀冒顿，冒顿盗得骏马一匹逃了回来。头曼见他机智有胆量，就命他率领1万骑兵征战。冒顿为夺得单于宝座和进行掠夺战争，急需训练一支绝对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的军队，于是煞费苦心，制作鸣镝。鸣镝制成后，他下令部众按鸣镝所射的目标去射，违令者斩首。后来，他率部众随父亲出猎，突然用鸣镝向头曼单于射去，左右一齐放箭，射死了头曼，终于夺得了单于宝座。

吴钩史话

吴钩作为兵器，始于春秋，当时冶炼技术早是青铜器时代，诸侯混战，烽火四起，兵器制造品种日益繁多，于是一种似剑似刀，又非剑非刀兵器——吴钩就诞生了。汉赵晔《吴越春秋·阖闾内传》云：“阖闾既宝莫耶之剑，复命于国中作金钩。令曰：‘能为善钩者，赏之百金’。吴作钩者甚众，而有人贪赏之重也，杀其二子以血衅金，遂成二钩，献于阖闾。而诣宫门求赏。王曰：‘为钩者多，而子独求赏，何异于众人钩乎？’作者曰：‘吾之作钩者，贪王之赏，杀吾二子以成两钩。’示之曰：‘何者是也？’时王钩甚众，形体相类，不知何在。于是钩师向钩器呼其二子名曰：‘吴鸿、泥稽，我在此，王不知汝之神也。’声未绝于口，两钩俱飞，着于父之胸，吴王大惊，乃赏之百金，遂服而不离身。”这个记载固然带有很大传说成分，但因阖闾的鼓励，吴国成为新兵器“吴钩”产地，当是可信的。吴王爱钩，还下令悬赏作金钩。

吴钩由于出招奇诡，处处有杀机，令敌手防不胜防。而倍受志士侠客的垂青，携之不离左右。历代不少诗人更是对吴钩赞咏不已，“门有连骑客，翠带腰吴钩”（西晋·张载）；“骢马金络头，锦带佩吴钩”（宋·鲍照）；“风胡有年岁，”“骢利比吴钩”（北周·王褒）；“结客佩吴钩，横行度陇头”（隋·孔绍安）。这一兵器因产于吴地，故名。至于它的形状，唐学者颜师古注《汉书·韩延寿传》说：“钩亦兵器也，似剑而曲，所以钩杀人也。”宋科学家沈括《梦溪笔谈》又云“唐人诗多有言吴钩者，吴钩，刀名也，刀弯。”从现在出土的铜钩来看，钩的形状似戟，只是戟上边为利刃，而钩上边为一浅钩形，故名钩。不过，其形制像刀、剑一样，并非一成不变，可根据各人的习惯爱好，打制出不同的钩器，明茅元仪《武备志》说，长钩多双手使用，短钩多左右手各持一钩，或另一手持其他兵器，相互配合使用。此外还有单钩、双钩、鹿角钩、挠钩、虎头钩等。吴钩招数毒辣、变幻莫测。格杀时，有钩、掏、搂、带、托、压、挑、刺、刨、挂、推、拉、提、锁等法，有“遇钩见血”之称，信然！

关云长没用过青龙偃月刀

凡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关云长的青龙偃月刀。关羽伏此刀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威震华夏，名噪一时。然而，历史上的关羽没有过青龙偃月刀。

关于刀剑之类的兵器，虽然见诸史籍颇多，但在陈寿的《三国志·关羽传》中通篇没有一个刀字，整部《三国志》也没有言及关云长使青龙偃月刀之事。其他如裴松之注和正史之外的杂史笔记亦无此种记载。直到隋、唐之前都无此说。

刀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在两汉时只是作为短兵器佩用。一般长度在1米左右，重也只有几斤。据《三国志》、《刀剑录》及有关资料，直到三国都没有出现长柄大刀。以双手执用的长兵器刀是到隋唐时伴随仪仗才出现的，而类似关云长使用的那种长柄宽刃的青龙偃月刀直到宋代才有。因此，说三国时关羽用82斤重的青龙偃月大刀作兵器，纯属子虚乌有。

那么关羽究竟使用何种兵器呢？据南梁陶弘景《古今刀剑录》记载：“关羽为先主所重，不惜身命，自采武都山铁为二刀，铭曰在万人。及羽败，惜刀，投于水。”这是比较可信的。因为这时以短刀作兵器已非常普遍，并成为军中主要武器，三国均大量铸造。

关羽使青龙偃月大刀的说法大约起于宋代。岳飞曾经画关羽像为身著甲冑，横马持刀，回头顾望，须髯飘动，犹如疆场获捷，缓辔回营之状。有人把此画刻于石上，今存龙门文物研究所。到元代《三国志平话》里面，关羽就使用大刀在沙场上冲锋陷阵了。到了明朝，经过文学家罗贯中的艺术加工，《三国演义》中的关云长就成为一个相貌堂堂，威风凛凛，胯下骑赤兔千里驹，双手挥青龙偃月刀，力拔山河，不可一世的英雄形象了。罗贯中还根据这柄大刀虚构出关云长“单刀赴会”、“刀挑锦袍”等动人的故事，更突出了关羽的声威和神勇。

撞车和滑车

《岳飞传》里“挑滑车”的故事脍炙人口，这“滑车”是个什么东西呢？

我国在4000多年前就已广泛使用石车，到殷代车已直接用于战争，此后发展形成了多种战车。粗分大约有野战车、云梯、撞车，巢车和跑车几类。还有一些特殊用途的作战车辆，如纵火车、扬尘车、搭桥车等。其中，撞车的出现不晚于公元前11世纪。

《诗经》中就有关于撞车的记载：“与尔临冲，以伐崇墉。”这里的“临”是一种云梯，而“冲”就是一种撞车。诗中还用“临冲闲闲”等诗句，来形容这两种战车的威力。

汉代之后撞车的使用已相当广泛，但直到明代茅元仪所著《武备志》中才会绘出了一些撞车的图形，从中可以看出撞车有多种用途，比如有的适于攻坚作用，有的用来杀伤敌人，有的可以撞击城门，有的则可输送兵员……不同用途的撞车结构有所不同，还常各有其不同的名称。

滑车是以撞车为原型而构思和创制的，利用陡峭的山坡向下滑行，不需人推，而且在车内堆放石块，加大下滑的推力和冲撞威力。在滑车的辆承和一些联接处，均采用一些铁零件增加强度，故称铁滑车。

在有些作品中，将滑车描绘成外装尖刀的圆滚子，有的还在圆滚子两端另装两个三角架，下安四轮，这似乎是以古代防守器械中的滚木做为原型进行构思的。

云梯和攻城

云梯是古代攻坚战中用以攀登城墙的器械，以可高登侦察敌情。一般认为，其发明者是鲁国巧匠公输般——鲁班。但有人认为，鲁班造的云梯是对原来云梯的一种改革而并非最早的。

现在考古材料中所见的云梯，只是图形。1935年河南汲县山彪镇出土的水陆攻战纹鉴的中层图案，展示的是攻城战。城上人用弓箭射击，城下人则架云梯攀登，双方进行激烈战斗。云梯有两种，一种是简单的木梯，一种底部有轮，前面三位武士托扛，后面一名武士推，梯的前端有飞钩（见图）。看来，后一种云梯的梯身可以各种角度上下仰俯，飞钩可保梯身免遭敌军推

拒和破坏，其技艺比较高。与《墨子》一书鲁班所造的云梯形状差不多。

古代军事家一般不主张攻打城邑，如军事家孙武认为“攻城为下”，但战国时，千百座戒备森严的城邑在大地上矗立起来，深沟高垒的坚城成为军事对抗中敌我双方争夺的战略战术要点，要塞攻防遂成为重要的作战形式。攻城，如果时间允许，往往采取长期围困的作战方式，使城内守军弹尽粮绝，“易子而食”，折骸而炊”，压制敌方守矢石。借助于辘车之类的战车掩护，接近城垣，或用云梯（如图）登城，或以冲车撞门，从而摧毁守军的防御体系。有的还在城外挖掘地道，攻入城中。防守方面，往往依托城外的制高点 and 临时搭起的城头工事居高临下的反击进攻，如以灰瓶、石块、箭矢打击接近城垣的敌军；用火焚烧敌方的冲车和掩护的牛皮车；在地下设置“地听”，防止进攻者挖地道等等。

古战场的“秘密武器”

公元 279 年，凉州发生叛乱，晋武帝命马隆带兵前去讨伐。在一次伏击战中，马隆命士兵事先把大量的磁石放置在一条狭窄夹道的两侧，并命令自己的部下脱下铁甲，改着犀甲，然后引诱敌人进入夹道。由于敌军身上都穿着铁甲，被磁石所吸引，叫苦不迭，以为对方有神兵相助。而马隆的部下却生龙活虎，任意冲杀，因而大获全胜。

这是我国古代把磁石当作秘密武器运用于军事上的一个出色战例。

公元 919 年（贞明五年）3 月，南方的吴越王命其子率战舰五百艘进攻吴国。吴派彭彦章、陈汾率水军迎战。4 月，两军舰队相遇，激战于狼山江（今江苏南通附近狼山的江面）。这一战，吴越舰队使用的秘密武器是灰、豆和沙子。

水战开始时，吴舰队求战心切，乘风首先展开攻击，吴越舰队则避开其正面冲击，绕出其侧后，待吴舰队疾驶过后，则自后紧跟。彭彦章见攻击未果，遂掉转舰首，逆风继续进击。而越王之子这时已巧妙地占据了有利的攻击阵位，于是顺风扬灰，趁“吴人不能开目”之机，迅速迫近敌舰，展开舷战。吴越舰队乘势又将沙撒主已船，而将豆子撒在敌舰上，吴水兵踏着浸染了鲜血的豆子，站立不稳，纷纷摔倒，舰队阵容大乱。吴越舰队抓住战机，乘胜纵火焚烧吴舰，吴军全军覆没。

中国古代火器

火器最早出现在唐代，北宋时，有了较快的发展。公元 969 年兵部令史冯继升进献火箭法。这种火箭在箭头扎有火药包，安上引线，作战时，点燃引线，将火箭射出，这是中国最原始的火药箭。宋仁宗时火器有 10 多种，其中有“毒药烟球”，临敌时将其点燃，抛向敌方，使敌人中毒，口鼻流血。公元 1132 年，德安知府陈规发明竹制管形火器，内装火药，能喷火焰，这是管形火器的开端。公元 1259 年，有人在一种名叫“突火枪”中装上“子窠”，借火药力量发射出，杀伤敌人，到了元朝，金属制成的火器逐渐增多，现藏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元至顺三年（1332）的铜火铳（炮），过去以为是世界上已经发现最早的金属火器，它比欧洲现存的最早火器约早半个世纪。

1989 年武威出土一尊西夏铜炮，这一重大考古发现，把金属管形火器的

铸造历史又提前了一个多世纪，这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古老的铜火炮。

这尊铜炮长 100 厘米。重 108.5 公斤。据认为，武威西夏铜炮的出土，纠正了明史“古所谓炮，皆以机发石，攻金蔡州城，始用火器”的记载。炮内遗存的 0.1 公斤火药和一枚直径约 8 厘米的铁弹丸，也是已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用于火器上的火药和铁弹丸，从而纠正了《辞海》子弹条中的结论。

明中叶以后，出现了空心的爆炸弹，这比以前实心弹更具有杀伤力。后来，改进炮身和炮弹，制成更加轻便的铁棒雷飞炮。明朝制造的水雷，其中有水底龙王炮用熟铁打造，内装炸药，安放引燃，并根据距敌船远近，调整引火长短、点然引火后，放在皮囊内，加以密封，载在木板上顺流接近敌船，引火燃尽，炮从水中爆炸。明朝的火箭也很先进，如火龙出水，飞空砂筒等，都是多级火箭，可以射出三五百米。明朝还发现了能喷火的喷筒类火器、能使敌人中毒的毒气弹，类似现代定时炸弹的“慢炮”等等，在火器制造技术上有很大的贡献。

明代已有“水雷”

一般认为，水雷是 18 世纪北美独立战争时期由美国人发明的；1956 年 10 月，苏联《军事知识》曾把 1769 后（土俄战争时期）俄国以“漂雷”炸毁土耳其通往杜那依的浮桥，说成是世界上第一次使用“漂雷”作战。实际上，这在我国明代嘉靖年间，名将唐顺之（1507～1560）在其《武备》一书中，就扼要地介绍了水雷的构造和性能。他所描述的“水底雷”的核心构造——“大将军”和其中的引火装置——“宿火”被密封在一个用宽木板制成的大木箱内，待粘缝的油灰干燥后，就将整个雷体沉入港口的小底处。因箱底用三品铁锚坠沉，故不致起浮或动荡。在上面的“机”（引火的击发结构）上，还要预先系上一条延伸到岸的长绳索。当敌船经过水雷时，岸上便可通过牵引绳索引火，而使火炮从水底向敌船底发射金属弹丸，将它击沉。

在明代的水上战争中，还发明和使用了一种叫做“水底龙王炮”的“漂雷”。这也在《武备志》中有较详细记载和示意图。这种“非触发式”的“漂雷”，在构造上还具有定时、定深度的特点。

甲冑小史

甲冑是古代战争中用以防护身体的装备。甲，又称介或函，其形似衣，用以防护人体。据说是夏朝少康之子杼和东夷作战时发明；另一种说法是蚩尤发明的。冑，又叫盔，秦汉以后称为兜鍪，其形似帽，用以防护人的头部。盔的发明始于黄帝时，宋高承《事物纪原》卷九时“兜鍪”，冑也，《黄帝内传》所述。盖玄女请帝制之，以备身也”的记载。在原始部落的相互冲突中，人们为了防护自己，可能受到动物，“孚甲以自御”的启发，用各种办法防护自己的身躯，因而出现了甲冑。

最原始形制的甲冑，大多采用藤木或皮革制成，开始是直接用兽皮披在身上防护，后来逐渐对它加以剪裁使之更合身，再后来，就以藤木为支架，蒙上皮革。商周时代主要使用皮甲。从考古发掘的资料来看，当时的甲一般用牛或犀、兕之皮制作，甲上涂有漆饰，甲片之间用皮条编缀，皮甲的局部可以活运，同时还出现一种为防护车战中战马的皮马甲。《考工记》（皮书

于战国时代)中对皮甲的制造工艺有着详细的记载。

春秋战国之交,随着铁兵器的运用,人们防卫手段不断改善,甲冑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防护装备中皮甲的主要位置让位给质料更坚固的金属铠甲了。西汉的铁甲,亦称“玄甲”,其专用于保护颈部的称“盆领”或“锻钲”保护臀部的称“钺”。由于汉武帝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抗击匈奴,促进了武器和防护装备的发展,因而使铁铠开始由较简朴的札甲发展为甲片精致细密的鱼鳞甲。东汉时,炼钢技术提高,铁铠质量也有所提高,铠甲的坚度增加。《太平御览》记载,蜀汉时诸葛亮“敕作部皆作五折刚铠”,这些甲在当时都是很贵重的高质量铠甲,后来则发展为军队的主要装备。西晋时代的甲冑主要是名为筒袖铠的铠甲,其主要形式是胸背的甲片联缀在一起,肩部有不长的筒袖,护头的兜鍪两侧有护耳,在臆额正当眉心处稍下突,顶部中心竖有长纓。到南北朝时,这种铠甲逐渐被两当铠和明光铠所代替。两当铠是由一片胸甲和一片背甲组成,在肩部用带扣联,腰上束带,因其与服饰中的“鈔档”相似而得名。明光铠在胸、背部分由左右两片近椭圆形的护组成,这种护很像镜子,在太阳照射下有“明光”闪烁,因而得名。由于明光铠防护性能较好,在南北朝末年流行渐盛,至隋代便取代了两当铠,成为骑兵装备铁铠的主要类型。铠甲发展到唐代有两个显著变化,其一,马铠在军队装备中逐渐少起来,人披甲只作为皇室贵族中仪仗队的点缀物;其二,供步兵使用的“步兵甲”逐渐盛行,据《唐六典》称,当时出现十三种铠甲。五代的甲冑在唐甲基础上有所改进,在形式上趋于规范化,到北宋便形成定制。宋代的铠甲制造达到了我国古代的高峰,铁甲制作十分精良,其坚度强度是以前不曾有的。

军鞋史话

我国的战争始于氏族时代,随着经济的发展,军鞋才从一般鞋饰中分离出来,并以靴(高到踝骨以上的长统鞋)、屨(麻葛等制成的单底鞋)、屨(燕子的一种,通常指木底的,或有齿或无齿,也有草制和帛制的)等主要鞋种构成了一部我国古代的军鞋史。

商墓中曾出土过一种胫甲,胫甲的作用是保护小腿。有人认为,胫甲是军靴的前身,军靴是胫甲与鞋结合的产物。商墓中也曾出土过一座跪坐玉人,足胫间缠绕行膝(绑腿布),这是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行膝形象。

两周后,人们开始了用火烟熏烤使皮变成革的材料制作军靴。沈阳周代废墟里曾出土堵塞铜泡钉靴,这是我国现已证实的第一双军鞋产物。今人曾在新疆楼兰挖掘出一双基本完整的皮靴,距今已4000年,这证实了古书记载的“靴本来自西域”的说法。将铜泡钉装饰到皮靴上是设计者从战时防护要求出发的精心构思,这是军靴源于胡履,别于胡履,胜于胡履的一大标志。

除了铜泡钉靴外,战国时期还有其他式样的履。楚墓中曾出土过一双“皮军鞋”,这种鞋的鞋面已采用近似现代的三块皮革相拼的设计造型,浅帮无舌。

纳底布鞋这时期也已被广泛用作军鞋,从山西侯马出土的东周武士跪像背面,明显可见鞋底上有整齐的一行行线迹,这与今天的纳底鞋完全一样。

秦始皇陵墓中出土了8000尊兵马俑,其中每一尊兵俑都穿着与自己身份相符的军鞋,这说明秦时的军鞋已按兵种及等级而各异。如此统一的鞋饰有

力地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秦代的军鞋材料和制作工艺已形成标准化。

出土的将军俑和骑兵俑则穿皮靴。秦代将不同的鞋饰纳入装备中国我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汉代军鞋不仅考虑实战需要，而且还十分讲究装饰——咸阳杨家湾出土的将军俑，脚着的是一双色彩斑斓的纹饰靴。

汉代的军鞋除靴以外，种类式样也日趋丰富，有舄（古代一种复底鞋，下层鞋底为木制）、圆口圆头布鞋、翘尖鞋、鸭舌鞋、草鞋，还有一种絢履（即鞋头上有装饰，有孔，可穿系鞋带）。

汉魏之际，我国西部和北部的少数民族开始向内地迁移，与汉族杂居。民族的广泛迁移的杂居，对这一时期的服饰有很大影响，在军鞋上明显反映出北方少数民族的特点。足蹬长统靴成为魏、晋、南北朝武将瓠士的主要戎装之一。

这一时期，北方高丽和南方等地的木屐传到中原并被用作军鞋。

隋唐军鞋的主要款式仍受“胡气”影响，靴仍为军鞋的主体。隋朝关于军鞋的规定很严格，武官一律着乌皮履。唐朝是我国服饰发展的一个高峰，武官服饰的最大特点为大口裤，束“吊腿”，着战靴，出征时将帅的常服也足蹬战靴。此类战靴一般都是软靴。

宋代武装服饰基本上继承唐制。宋代的女将们也配穿战靴，甚至文官也常穿戎服，脚着战靴，以应战事。

元朝的服饰缺席自然就以蒙古人的习惯为主流了。元代的军鞋根据蒙制和汉制戎服的不同而各异：蒙制开装的特点为窄口裤，长皮靴，汉制武服则以软战靴为主要特色。

明代的军鞋沿用唐宋之制，但等级比较分明。

清代的军鞋，无论是材料、工艺及品种都极为丰富，一般征战时为薄底，以利战事；一般武官着布鞋，兵丁则下穿长裤，脚缚行腾，着薄底鞋。北方寒冷地带也有着黑氈靴、马拉鞋的。

清末民国初，国外皮制马靴传入我国。19世纪中叶，我国开始引进皮鞋技术。20世纪初，又兴起胶鞋工业。皮鞋和胶鞋便逐渐成为主要的军鞋鞋饰，并一直应用至今。

第二章 近、现代军事博览

北洋军阀们的绰号

歪鼻将军——段祺瑞 被称为“北洋之虎”的北洋军阀皖系头子段祺瑞，历任北洋军第三镇统制、江北提督，民初北洋政府陆军总长，国务总理、执政等要职。他被袁世凯任为上将军，但在背后有人曾戏称他为“歪鼻将军”。这个诨号是有来由的，原来段祺瑞在大怒之下鼻子会向左歪斜过去，然后要用按摩慢慢地将它正过来。

糊涂将军——冯国璋 被称为“北洋之狗”的冯国璋，虽曾任过江苏都督、代理大总统之职，人们背后却称他们“糊涂将军”。

有一件事，说明冯国璋的糊涂：1917年7月6日，冯国璋代理大总统。8月23日，新任的塞北关监督林摄到总统府来谢委。冯国璋刚午体起来，懒洋洋地问道：“你从什么地方来？”林摄心里有点纳闷，总统怎么连我住在何处都不晓得？忙答道：“我久住北京。”冯又问：“你现在做什么事？”林摄更有点莫名其妙。但也只好回答道：“刚刚发表为塞北关监督。”冯又问一句：“谁叫你做的？”林摄一听简直惊呆了，心想：这委任状不是你发的吗？忙答道：“总统的任命！”这个大糊涂虫自己惊诧起来了，竟又忙问：“我几时放你做塞北关监督呀？”林摄答道：“明令发表已有数日。”

他“哦”了一声，似乎有点明白过来了，说：“咽，对了，有一天，我睡午觉，有人拿件命令来请我盖章，大概就是那回事吧！”他盖了章连命令内容也根本未看，可见其糊涂之极了。

辫子将军——张勋 1917年7月1日，北京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复辟帝制。它的罪魁祸首，就是自命为效忠清廷的“辫帅”张勋。他因为被袁世凯授予“定武上将军”，所以又被人称为“辫子将军”。

张勋出生于一个小商贩家庭。30岁从军，从一名厨子爬上了提督高位，所以他对清朝的“皇恩”念念不忘。1912年，他虽依附民国，实为投靠袁世凯。他投民国有一个先决条件，即不剪辫子。袁世凯也拿他没有办法。他还不准自己手下几万名官兵剪辫子，所以，当时称他的兵为“辫子兵”。

笑虎将军——孙传芳 孙传芳总是笑容可掬，给人一个亲切和蔼之感。其实，他心狠手辣，往往把事办绝，所以人们称他为“笑面虎”。因他曾任过闽浙巡阅使，授过“属威上将军”，所以又有人称他为“笑虎将军”。

1925年11月他和奉军作战，俘获了张宗昌的前敌总指挥、山东军务帮办、奉军四十七混成旅旅长施从滨。这时，施已七十高龄，见了孙还向他行了个军礼。孙表面上笑咪咪地道：“施老，你好呀，你不是来当安徽督办的吗？你马上去上任吧！”实际上他命令将施拉到车站南边的空旷地上枪毙了。他这样绝情的做法，给自己酿了恶果。十年以后，1935年11月13日孙传芳在天津居士林听讲经时，被坐在他身旁的、施从滨的女儿施剑翘开枪打死了。

大舌将军——吴俊升 奉系军阀的重要头目之一，黑龙江省督军吴俊升，有个诨号，号“吴大舌头”，所以又称为“大舌将军”。

吴俊升幼时家贫，嘴受冻伤，从此留下了淌口水的后遗症。他因嘴冻伤，加之舌头较大，所以说起话来，总发出“唔-唔”之声，含糊不清，所以就有了“吴大舌头”这个“雅号”。在东北，要说吴俊升这个大名，真还没几个人知道，但一提起吴大舌头，便无人不知了。

“大舌将军”依附张作霖称霸东北，当了安国军第六军团团长、东三省保安司令。他为人十分残暴，仅举一例：1922年他刚当黑龙江督军不久，派人到通河、铁力、通北等县去招抚那一带的土匪，编成一团。1923年春，吴竟将这个团的800余名官兵全部枪杀，无一幸免。

他的荒淫无耻也很出名。他有六爱：爱良马、爱美女、爱猴子、爱钱财、爱吸毒、爱好枪，可说是集军阀之恶习于一身。他有2000匹良马，5000万家财，7个老婆。最荒唐的是堂堂的督军公署后院里，竟有一大片猴舍，大猴、小猴、公猴、母猴成群结队，上窜下跳。

这个靠着张作霖起家的“大舌将军”，1928年在皇姑屯和张作霖一同被日军炸死。

狗肉将军——张宗昌 奉系军阀张宗昌有一个十分有趣的诨号：狗肉将军。关于这个诨号的来历，有种种解释，最普遍的有两种：一是张宗昌喜欢狗肉；二是张宗昌喜欢赌，特别是喜欢赌“牌九”。广东人的“九”字读音为“狗”，赌“非牌”又称为“吃狗肉”。1916年冯国璋任副总统后，他被委派为侍卫武官长，曾去过北京，和一些广东军阀、官僚们在一起聚赌，“狗肉将军”就是那时叫出来的。

厕所将军——王怀庆 直系将领王怀庆，是袁世凯的亲信，在北洋军阀统治期间，他曾以十三师师长兼任京畿卫戍司令和步军统领达七年之久。这个赫赫一时的“宣武上将军”却有一个极不雅的诨号——“厕所将军”。

这个诨号是怎么来的呢？王怀庆在北京东四牌楼十一条胡同，有一所规模宏大的宅第，他每天白天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在厕所里度过的。这位将军的厕所很特别，是在他的办公室内，有两间宽敞整洁的屋子。屋中间设有一个“大便椅”，椅下铺了细净的炉灰，椅前设办公桌，上面放了办公文具。他的一些属下有事请示报告，都必须齐集在厕所里听候指示。他在厕所办公，常常要持续二、三个小时之久，一离开厕所，他就去寻欢作乐了。

黄埔军校的历史沿革

一、黄埔时期

1921年12月，孙中山会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时，马林建议孙中山创办军官学校。孙中山完全赞同，并于1923年8月至12月派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问苏联，着重考察军事，为创建军校作准备。1924年1月24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聂荣臻也是筹备工作人员。1924年5月3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军校校长，孙中山自任军校总理，廖仲恺为党代表。军校设教授、教练、管理、军需、军医五部，叶剑英任教授部副主任。后增设政治部，第三任政治部主任为周恩来。在中央和苏联的大力支援和帮助下，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于1924年6月16日在广州黄埔岛开学，简称“黄埔军校”。

1926年2月，军校易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28年5月，军校更名“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1928年9月，又改名“国民革命军黄埔军官学校”。1929年底第七期毕业后停办。

二、南京时期

1928年3月6日，南京政府成立“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实行委员制领导。校务委员会由蒋介石、胡汉民、吴稚晖、戴季陶、冯玉祥、阎锡山、何

应钦、李宗仁、李济深等人组成。何应钦一人为常委，张治中为教育长。1933年6月恢复校长制，蒋介石为校长，实际事务由教育长负责。军校招生为第7期到12期。

三、成都时期

从13期起，军校迁到成都。1946年初，改名“陆军军官学校”。1946年4月，关麟征任教育长。1947年年底，蒋介石免兼校长，关麟征升任校长。1949年9月由张耀明接任校长。国民党在大陆失败时，第23期3000多人随胡宗南去西昌一带，除投诚、被俘外，全部被歼。至此，军校覆灭。

“铁军”实指第四军

铁军是指北伐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中的第十师、第十二师及叶挺独立团，并不是仅仅指叶挺独立团一个团。

1927年国民政府委员蒋作宾在朱师长、叶副工就职那天说：“我第四军是铁军，完全是民众中间说出来的。民众已充分认识第四军是他们的军队。”

1926年9月30日《广州民国日报》发表的《第四军前方破敌志要》一文中提到，第四军“自克平江之后，即兼程追敌，奋不顾身，故汀泗桥与贺胜桥，独奏奇功，将吴贼精锐，全数扫灭，铁军之号，遂洋溢于湘鄂间”。

1927年1月25日，武汉粤侨联欢社把一面铁盾赠给第四军。铁盾正面铸有“铁军”二字，上款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全体同志伟鉴”，北面有一首四言题辞。

国民党早期授衔的上将

上将是国民党军队中最高军衔。1935年开始授衔。上将军衔分特级上将、一级上将、二级上将和中将加上将衔四种。1935年至1938年共有71人获上将军衔。

特级上将1人：蒋介石。

一级上将10人：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李宗仁、唐生智、何应钦、朱培德、陈济棠、李济深、陈绍宽。

二级上将26人：白崇禧、顾祝同、刘峙、何健、傅作义、龙云、杨虎城、于学忠、刘镇华、何成浚、刘湘、宋哲元、韩复榘、万福麟、朱绍良、陈调元、商震、蒋鼎文、徐永昌、徐源泉、程潜、杨爱源、李烈钧、陈仪、石敬亭、张钫。

中将加上将衔34人：陈诚、卫立煌、张治中、张之江、钱大钧、鹿仲麟、马鸿逵、薛岳、刘建绪、余汉谋、潘文华、王瓚绪、王陵基、邓锡侯、黄琪翔、罗卓英、蔡廷锴、庞炳勋、孙连仲、吕超、李品仙、朱缓光、廖磊、夏威、王树常、张发奎、熊式辉、马占山、孙震、杨森、卢汉、张自忠、孙蔚如、胡宗南。

民国史上的两个西北军

在民国史上，为什么有一支冯玉祥的西北军，还有一支杨虎城的西北军呢？

冯玉祥原属北洋军阀直系将领，1925年初，被段祺瑞政府任命为西北边防督办，冯统辖的军队也被扩编为6个师、3个旅。1926年9月，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宣布全军加入国民党，率部经宁夏、甘肃到达陕西解西安之围，故冯部被称为西北军，是就行军方向而言的。

1930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后，冯玉祥的西北军完全解体。

杨虎城在1917年陕西靖国军成立时就任支队司令，1927年曾编入冯玉祥部任国民联军第二路军总司令、第二集团军暂编第二十一师师长等职。1930年被蒋介石任命为第十七路军总指挥、陕西省政府主席、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部成员大部是西北籍，部队一直转战在关中地区，故杨部被称为西北军是就活动地域而言的。1936年西安事变后，杨虎城被迫辞职出国考察，十七路军被蒋介石分化瓦解，缩编为第三十八军。

第一支坦克部队

1933年，中国政府派徐庭瑶率一军事代表团出访英国，从英国购回30辆坦克，于1935年在南京方山建立起中国第一支坦克部队——中央陆军直属战车营。同时还成立了一所“陆军交辘学校”，以培养机械化部队军官。由蒋介石兼任校长，徐庭瑶任教育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战车营和交辘学校迁至湖南金井。1938年，中国政府又从苏联购回T-26型轻型坦克100辆，在苏联顾问团帮助下组训坦克兵团，将原战车营扩充为装甲兵团，团长胡献群，番号为1149团，隶属第200师杜聿明部。不久因战局变化又迁至广西全州，第200师改为第十一军。军长由徐庭瑶兼任，副军长为杜聿明。第十一军是中国建立的第一支正规坦克部队。与此同时，还将原交辘学校分别改建为“中央陆军机械化学校”和“辘重兵学校”，直属国防部，两校分别迁往湖南洪江及贵州远。陆军机械化学校于1944年秋天再迁至重庆潼南县，抗战胜利后又迁至徐州。解放战争时期，鲁南、淮海等战役几乎使这支装甲部队全部送给了人民解放军，其残部和陆军机械化学校随国民党政府逃到了台湾。

抗战中的中国远征军

1942年3月，国民党政府以罗卓英为司令，率第五军（杜聿明）、第六军（甘丽初）、第六十六军（张轸）及部分空军组成远征军，赴缅甸配合英美军对日作战，这就是抗日战争期间的中国远征军。

1942年初，日军第十八军司令官田祥一郎率四个师团及若干特种部队计10万余人，集结在泰国境内，准备攻取缅甸，并断绝中国的国际交通线。缅甸为英国属地，当时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英军驻缅兵力不足，经与美国商定由中国派兵动摇，蒋介石听取美国意见组成远征军，并以美国将军史迪威为参谋长。

远征军入缅后主要在缅北山岳丛林地带参加了两次战役。一次是缅北防御战役。1942年2月，日军侵入缅甸，3月，远征军与英军第一师及战车部队一部在曼德勒（距仰光北约500余公里）西南威格马、仁安羌组织防御，日军发起进攻后，经4天战斗就全线突破中英军的防御，并包围了英军约两

个旅。远征军在这次战役中起的作用是：以一个师的兵力解围了被围的英军。以后就节节败退，于5月上旬退入印度，至此，日军全部进占缅北。另一次是反攻缅甸战役。中国远征军溃退到印度后，在兰伽进行了整编，改编为新一军，并选择丛林地形进行了半年多的训练。1943年盟军转入反攻，美英中联军联合反攻缅甸。新一军在缅北参加胡康谷地、孟洪、密支那等战役，取得胜利。并修通了中缅公路，之后返回国内。

中国人民解放军名称沿革

中国工农革命军 1927年8月1日，由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在党影响下的北伐军3万余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9月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后，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

中国工农红军 简称“红军”，由中国工农革命军及其他革命武装于1928年5月以后陆续改称。

八路军 我党为战胜日本侵略者，根据同国民党达成的协议，于1937年8月将红军主力部队改为国民革命第八路军（又称第十八集团军）简称八路军。

新四军 1937年10月将江西、福建、广东、湖北、河南、浙江、安徽等八省的红军游击队分别集中，改名为中国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 从1945年8月中旬开始，我党中央将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力量，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中共军队领导体制的演变

在战争年代，我军党的领导体制，大体经历四个阶段。

一、党委制

南昌起义时，即建立了党的前敌委员会，作为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军和部分师建立了党委会，团建立了党总支。随后，毛泽东率秋收起义的余部，在江西永新县进行了“三湾改编”，提出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1928年5月4日，朱、毛两军在江西宁岗县砦市召开会师大会，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并成立第四军军委，朱德任书记。营、团成立党委，连有支部。军委归前委领导，前委书记由毛泽东担任。在此前后，湘鄂、鄂豫皖等地的红军，也自上而下地建立了党委，并设立了党代表。

1929年12月，在“古田会议”议中，明确指出“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

二、政委集权制

王明路线掌权后，照搬苏联红军的条例，决定“红军中包办一切军事行政的各级党的委员会应即取消”。从1932年起，各根据地红军先后取消了党委制，并扩大了各级政治委员的权力。1932年制订的《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规定：“政治委员不仅是苏维埃政权的红军中的全权代表”，“有监督一切军事行政的权力”。甚至强调“政治委员在与同级军事指挥员有争执时”，“有停止军事指挥员命令之权”。结果千万军政工作严重失调，削弱了军事指挥员在战争中的主观能动性。

三、军政委员会制

“七七”事变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曾一度取消政委制，政治部改为政训处，不久又恢复。

抗日战争中期，中央军委颁布了《军政委员会条例》。规定：“在军、师、旅、团及纵队、支队、军区、分区等级成立军政委员会”，作为“执行上级指示，决定该部大政方针，布置工作及检讨工作的计划机关”。

四、党委制的恢复和发展

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上，中央原则上决定，各部队要依据古田会议原则，组织军中党的各级委员会。

1946年2月27日，中央明确指示各部队，“应依据古田会议的原则，组织军队中各级党委会，以避免军中单纯的首长制产生的一些缺点”。“凡关于作战、工作、政策及干部等问题”，在一般情况下，均须由“各级委员会经过民主讨论和决定”。此后，全军恢复了党委制。同时取消了军政委员会。1947年7月28日，军委总政治部颁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党委员会条例草案（初稿）》，对各级党委的性质、基本任务，职权及其产生、机构，均作了详尽的规定。1948年9月，毛泽东代中央起草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文件，要求各级必须建立健全党委会议制度。从此，军队中的党委制沿用至今。

我军第一面军旗的诞生

1927年9月初，毛泽东来到安源，具体讨论了秋收农民起义的部署，决定把我党领导的湘东、赣西一带的地方武装和从武汉来的国民政府警卫国共5000人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何长工、杨立三、李明义等同志根据前委的指示，在江西修水设计了第一师的军旗；旗底为红色，象征革命；旗中央的五星，代表中国共产党；五星内有镰刀斧头，代表工农；旗面左侧与旗和旗杆相连的一条白布上，写着“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旗的含义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武装。9月9日，在这面鲜红的军旗指引下，著名的秋收起义爆发了，而我军的第一面军旗也就这样诞生了。

“八一”军旗的由来

1949年初，中共中央预见到全国胜利即将到来，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提出制作我军军旗、军徽的方案，并责成周恩来主持这一工作。随后各野战军送来了许多设计方案，在研究过程中，毛泽东亲自听取汇报，并指示军旗上要有“八一”二字，表示中国人民举行南昌起义反对国民党的历史节日；旗上要有五角星，象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周恩来强调，设计必须体现毛泽东的构想，军旗要以革命的颜色，广大中国人民的传统喜庆的颜色——红色为主体。星和字用黄色，旗杆要有红黄二色旋纹，顶部要装上一个红樱枪的矛头，饰以红穗，象征人民军队的由来。1949年初夏的一天。毛泽东、周恩来在北京香山毛泽东的住所，批准了军旗的最后审定样式。周恩来批示：定于“6月15日，军委颁布军旗的命令”。

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颁布“中国人

民解放军军旗及军徽样式”。命令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为红底，上缀金黄色的五角星及‘八一’两字，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自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诞生以来，经过长期的奋斗，正以其灿烂的星光，普照全国。”“旗杆套用白色”，“旗杆为红黄二色相间之旋纹，上置黄色矛头”。命令还对军旗的具体制法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八一”军旗就这样诞生了。

“八一”军徽

军徽是军队或军种标志的象征。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枚军徽诞生于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夕。是年6月15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徽的样式。命令中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徽的样式为镶有金黄色边的五角红星，中间嵌有金黄色的“八一”二字，简称“八一”军徽。“八一”军徽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于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

从1951年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空军的军徽定为以“八一”军徽为主体，海军军徽藏蓝色底，衬以银灰色铁锚，蓝色象征海洋，铁锚代表舰艇；空军军徽衬以金黄色飞鹰两翼，象征人民空军英勇果敢，飞行无阻。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和海军、空军军徽还用作帽徽、领花图形和飞机、舰艇、坦克等装备上的标志。

“红军”名称的由来

1927年南昌起义的部队仍沿用着国民革命军的番号。“八七”会议后，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的部队称工农革命军。同年11月13日，潘恰汝、吴光浩等领导的黄麻起义部队称“农民自卫军”。14日清晨，黄安城解放了，吴兰阶先生非常高兴，写了一副出色的对联贴在县衙的大门上：“痛恨绿林兵，假称青地白日，黑暗沉沉埋赤子；克复黄安城，试看碧云紫色，苍生济济拥红军。”这是第一次呼出的“红军”称号。

年底，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等领导广州起义时就打出了“工农红军”的旗帜，叶挺和叶剑英被任命为“工农红军”正副总指挥。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一部分队伍和在湘南起义的农民军与毛泽东领导的队伍于井冈山宁冈县砦市胜利会师后，中央于5月25日发布了《中央通告第五号——军事工作大纲》，其中明确地指出：“可正式命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不久，毛泽东、朱德又根据中央6月4日“关于你们的军队，可正式改称红军”的指示信，便正式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从此，全国各地的工农革命军先后奉命改称“红军”。

“新四军”来历和含义

在黄埔军校成立以前，粤军第一师一直是孙中山所唯一倚重的武力。师长邓铿，对孙先生始终忠诚、服从。1922年孙先生第一次北伐，出师桂林，第一师即为主力，后陈炯明叛变，第一师又保护了孙先生回师广州。1922年3月，邓铿被陈炯明暗杀后，李济深任师长，1926年北伐前夕，粤军第一师

扩编为第四军。在当时的7个军中，以第四军实力最为雄厚，其中共产党员也最多。国民革命军出师，第四军出湘鄂，在前线所向无敌，有“铁军”之称。叶挺率领的教导团，在汀泗桥、贺胜桥两个有名战役中，击溃军阀吴佩孚主力，厥功最伟。所以，后来在抗日战争爆发，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时，将江南游击队改称为新四军，以纪念四军的历史传统。

“N4A”臂章的由来

新四军从1938年建军，到1947年1月撤销番号，在10年中曾使用过多种证章。如“抗敌”（图案是抗敌两字配以一名持枪的战士，由马达设计）、铜质圆形章、“新四军”（布质方形臂章）等。但影响之大莫过于以“N4A”为符号的臂章。

“N4A”臂章的设计者是庄五洲。他是一位华侨，父亲是台湾人，母亲是日本人，一家在南洋谋生。他从小酷爱绘画，在学校专攻西洋画。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庄五洲穿过重重封锁来到盐城后，满腔热情地投身到根据地工作中。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刘少奇和陈毅决定开办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简称华中鲁艺）。庄五洲与莫朴、许幸之等人一起担任鲁艺美术系教学工作。美术系有50余名学生，是人数最多的一个系。每一位新来的同学，第一件关心的事便是希望尽快穿上一套新四军军服，佩上新四军的臂章。庄五洲为此精心设计了一种新臂章；用英文NEW（意为新）的开头字母N、4（代表中“四”字）和A（军的英文略号）组成“N4A”表示“新四军”。这种臂章用石版印刷，线条简洁流畅，配以白底蓝字，醒目有力，深受同学欢迎。“N4A”臂章很快就在新四军中广泛使用。

“中国人民志愿军”名称由来

50年代初，当我党中央关于抗美援朝的决策形成以后，即着手研究以什么名义出兵的问题。开始时，毛泽东主席与周恩来总理研究，想用“支援军”的名义出兵。他们决定征求一下民主人士的意见。

征求意见下达后，中国民主建国会领导人黄炎培即登门造访，毛泽东和周恩来一同听取他的意见。

“有个问题要考虑呀。自古道师出有名，名不正言不顺，这个仗不好打。”黄炎培诚恳地说道。

“我们叫支援军，”周恩来说，“支援朝鲜人民嘛。”黄炎培摇着头说：“这样叫，是不是师出无名？需要考虑。”

“怎么是师出无名？”

“‘支援军’，那是派出去的。谁派出去支援？国家吗？我们是不是要跟美国宣战？”

“哦，有道理！”毛泽东伸手从笔筒里抓起一支铅笔，将“支援”两字划去，改成两个大字：“志愿”。接着说道：“我们不是跟美国宣战，不是国与国宣战。我们是人民志愿的嘛，这是民间的事儿，人民志愿去朝鲜帮助朝鲜人民，而不是国与国的对立。”

周恩来兴奋地作了一个手势：“对，世界上有许多志愿军的先例，马德里保卫战就有各界来的志愿兵。”

黄炎培频频点头，笑着：“师出有名则战无不胜！”
“中国人民志愿军”之名就此产生了。

解放军各兵种成立的时间及第一任首长

空军成立于 1949 年 11 月 11 日，司令员刘亚楼，政委肖华。
海军成立于 1950 年 4 月 14 日，司令员肖劲光兼政委。
炮兵成立于 1950 年 8 月 1 日，司令员陈锡联。
装甲兵成立于 1950 年 9 月 1 日，司令员许光达，副政委向仲华。
公安军成立于 1950 年 9 月 22 日，司令员罗瑞卿兼政委。
防空军成立于 1950 年 10 月 23 日，司令员周士第，政委钟赤兵。
工程兵成立于 1951 年 3 月 2 日，司令员陈士榘，政委黄志勇。
铁道兵成立于 1953 年 3 月 5 日，司令员王震。
第二炮兵成立于 1966 年 7 月 1 日，司令员向守志，政委李天焕。

为什么没有红三方面军

有关党史资料记载，中国工农红军只有一、二、四方面军而无三方面军，这是由于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各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的过程中，情况发生变化所造成的。

1930 年红军发展到 10 万人 5 月下旬，党中央在上海召开苏区代表会议；6 月初，又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研究红军的编制问题。当时打算将活动在赣南和闽西、湘鄂西、湘赣南、鄂豫皖等五个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分别编为红一至红四共四个军团，然后再扩编为四个方面军。当时彭德怀任红三军团团长。在实际发展过程中，红三军团没有单独扩编，而是和红一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市会合，扩编为红一方面军，彭德怀任副总司令。

1933 年秋，中央军委计划把新成立的四个军团合编为红三方面军，但后来由于一部分组成了“北上抗日先遣队”，一部分跟红军进行长征，合编为三方面军的计划又未能实现。

中共最早的警卫部队

蒋介石 1927 年“四·一二”背叛革命后，加紧了对革命的镇压，党内也出现了叛徒和内奸，危害极大。这年 6 月，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成立不几天，在一次省委会议刚散会后，就遭国民党特务包围，造成陈延年等同志被捕。血的教训使党中央和其他一些省委深感有必要抽出一部分同志组织起来，经过专门训练来对付国民党特务分子和叛徒对我党的破坏。于是，在原来工人纠察队的基础上，由中共江苏省委选了政治上可靠、枪打得准、并且对上海情况熟悉的党员，组成短小精悍用手枪武装起来的一支战斗队，史称“红队”。它就是我党最早建立的警卫部队。党在武汉的时候，也有一支类似中共江苏省委“红队”的队伍。党中央搬到上海，也将这支队伍带到上海。这样，在 1928 年时，上海出现了两支“红队”，分别属于党中央和中共江苏省委领导。因为情报工作未开展起业，两支队伍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不少问题，又不易于统一指挥。党中央决定，将两支“红队”合二为一。这年秋天，党中央一

支崭新的“红色恐怖队”调整完毕。任命刚从苏联学习回国的谭余保主持这个队伍，由中央“特科”三科即行动科领导、指挥（该科科长是顾顺章，后为陈赓）。其任务就是专门负责镇压党内出现的叛徒、内奸和国民党的特务、宪兵、军、警、帝国主义的包探、巡捕，保卫党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

我军第一支仪仗队

重要国宾来访时，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要陪同其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我军最早组建仪仗队这支特殊部队，是在人民解放战争初期。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真诚地为争取和平、民主、团结而斗争。1946年2月，为了在延安迎接以调处国共双方关系为名来访的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党中央特地指示我军驻南泥湾某团组建一支仪仗队。由该团团团长罗少伟任营长，魏志明任教导员，从全团中精选500名年轻、精干、军事姿态好的战士，编成三个连，组成了我军历史上第一支仪仗队，并且马上开到延安进行紧张训练。

3月4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陪同马歇尔在机场停机坪检阅了这支仪仗队。仪仗队三个连呈横队排列，每连排头是炮班，其次是机枪班。战士们穿着崭新的军装，紧握从日军手中缴获的武器，昂首挺胸，接受了检阅。

我军战绩表

工农红军时期（1931.1~1933.10）：消灭敌军31.7万余人；俘获敌军19.8万余人；缴获各种枪支16.5万多支。

抗日战争时期。毙伤日军52万余人；俘虏日军6213人；毙伤伪军49万余人；俘虏伪军51.2万余人；投诚18.3万余人。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我军损失61.7万余人。

解放战争时期（1946.7~1950.6）

1. 消灭敌军兵力

正规军：2个战区总部、1个“剿总”前进指挥部、3个军政长官公署、8个“绥靖公署”、2个警备总部、1个长官司令部、3个绥靖区司令部、1个边区司令部、35个兵团部、4个整编军部（内3个兼整编师部）、183个军部，572个整师。28个师部、411个整团、526个整营。上述兵力约等于762个师零2个营。连同消灭营以下兵力计算在内，共5542470人。

非正规军：103个整师、9个师部、508个整团、420个整营。上述兵力约等于931个团。连同消灭营以下兵力计算在内，共2528880人。

总计消灭敌军8071350人，内被俘者4586750人，毙伤者1711110人，向我投诚者633510人，起义者846950人，接受我军改编者293030人。

2. 毙伤俘与投诚敌高级军官

总计1668名，其中投诚者273名（内正规军166名，非正规军107名），被俘虏者1310名（内正规军941名，非正规军369名），被击毙者85名（内正规军55名，非正规军30名）。

3. 缴获：大小炮54430门；机枪319958挺；长短枪3161912支；掷弹筒

21462 个；枪榴筒 15191 个；火焰喷射器 228 具；飞机缴获 189 架，击毁 190 架，舰艇缴获 200 艘，击毁 9 艘；坦克缴获 622 辆，击毁 156 辆；装甲车缴获 389 辆；机车缴获 1016 辆；汽车缴获 22012 辆；骡马缴获 195475 匹；子弹缴获 507984700 发；炮弹缴获 5527400 发；手榴弹缴获 3635800 发；炸药 1458800 斤。

4. 解放国土面积和人口

共解放国土面积 8495500 平方公里；解放县以上城市 2031 座；解放人口 482532000 人。

百团大战史实考订

袁旭在《抗日战争研究》1991 年第 2 期著文，就长期以来莫衷一是的百团大战史实问题作了考订。提出 参战兵力：过去说法有 105 个团、104 个团、115 个团，实际有的是把一个团参战的次数（团次）算作团数。据聂荣臻、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关向应 3 个参战集团战斗统计，应为 80 个团左右。战绩；过去有 1 万余、2 万余、2.9 万等说，现据朱彭电报及 3 个参战集团战斗统计，数字为：歼日伪军（毙、伤、俘、反正）3 万，破坏铁路 474 公里、公路 2600 公里，拔据点 293 个。我军伤亡：据总政资料、朱彭电报、战斗统计，伤亡 17000 余人，其中阵亡 5800 余人，其他为中毒气。

抗美援朝伤亡数字

根据《北京青年报》1989 年 12 月 19 日报道，在抗美援朝中，我志愿军共歼敌 700813 名，内含美军 285618 名，击毁击伤敌机 10629 架，毁伤敌坦克 2000 余辆，并缴获在量装备物资。敌人在战争期间运到南朝鲜的作战物资 7300 万吨以上，直接战费消耗在 200 亿美元以上。敌我伤亡对比是二比一，敌我作战物资费用的消耗对比为九比一。

我军颁发的军功章

1933 年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决定，对参加南昌暴动，创建根据地和人民军队中立下战协的同志颁发红星奖章（1 枚）。

1950 年，中央人民政府、中央军委对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的代表颁发纪念奖章（1 枚）。

1955 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对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武装斗争、功勋卓著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分别颁发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各 1~3 枚），和这三个级别的奖章（共 12 枚）。

1979 年，中央军委决定，对作战及部队工作中成绩卓著者颁发军功章（一至三等功各 1 枚）。另对中央军委授予称号的英模颁发一级英模奖章；对大军区一级授予称号的英模授予二级英模奖章。

1987 年，解放军三军总部决定，对出席全军英模大会的代表颁发荣誉证书。

建国后颁发的军事奖章

八一勋章 国家主席授予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工农红军时期参加战争有功人员的勋章。共分三级：一级授予当时师以上干部；二级授予团级和营级干部；三级授予连以下人员。

八一奖章 国防部长授予在工农红军时期后期参加革命战争的连级以下人员的奖章。

独立自由勋章 国家主席授予解放军在抗战时期参加革命战争有功人员的奖章。共分三级：一级授予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游击队中旅、支队及相当于旅、支队以上干部；二级授予当时的旅级和团级及其相当干部；三级授予当时营级和连级及其相当干部。

独立自由奖章 国防部长授予在抗战时期参加八路军、新四军或脱产参加抗日游击队两年以上或不满两年但作战负伤残废的排级以下人员的奖章。

解放勋章 国家主席授予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有功人员的勋章。共分三级：一级授予军级以上及其相当干部；二级授予师级及其相当干部；三级授予团级和营级及其相当干部。

解放奖章 国防部长授予在解放战争时期参加解放军两年以上，或虽不满两年但因作战负伤残废的连级以下人员。

功勋荣誉章 由中央军委授予战争时期入伍或参加革命工作的军队离休干部。功勋荣誉章设：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独立功勋荣誉章、胜利功勋荣誉章。

中国空军之最

最早的空军领导人——司令员刘亚楼、政委肖华。最早成立的航空兵部队——空军第四混成旅。最先击落敌机的飞行员——志愿军空军大队长李汉1951年1月击落侵朝美机一架。击落敌机最多的飞行员——赵宝桐，先后击落敌机7架。最早击落敌机的地空导弹作战——1959年10月7日地空导弹部队击落国民党空军RB-57D型高空侦察机一架。最早装备的国产喷气歼击机——歼-5型歼击机。最早装备的国产运输机——运-5型运输机。最早装备的国产直升机——直-5型直升机。最早装备的国产超音速喷气式歼击机——歼-6型歼击机。最早装备的国产强击机——强-5型强击机。最早装备的国产轰炸机——轰-5型轰炸机。最早装备的国产地空导弹——红旗一号地空导弹。

中国蓝色贝雷帽部队

中国第一支蓝色贝雷帽部队于1992年3月正式成立。这支中国政府受联合国委托组建的军事工程部队开赴柬埔寨，参加柬埔寨过渡时期联合国权力机构的维持和平行动。

1991年10月23日，中国、美国、原苏联、法国、越南、柬埔寨、日本等19个国家的外长和其他政界要人，在巴黎联合签署了举世瞩目的全面政治解决柬埔寨冲突的和平协定。为此，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决定向柬埔寨派驻“柬埔寨过渡时期联合国权力机构”。1992年2月中旬，联合国秘书长加利通过外交途径，请求中国派出47名军事观察员和至少300名军事工程人

员，参加联合国权力机构的维持和平行动。我国政府很快答复联合国，同意派出 47 名军事观察员和由 400 名工程人员组成的军事工程大队前往柬埔寨。

《联合国手册》规定，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军事人员一般戴蓝色盔帽和蓝色贝雷帽，被称为“蓝色部队”。这次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预计耗资近 20 亿美元，投入 15900 名军人，其中军事工程人员 2230 人，分别由中国、波兰、泰国等国承担。我首次组建“蓝色”军事工程大队，携着中国军事人员从此登上联合国维持世界和平的舞台。

中国蓝色贝雷帽部队是由人民解放军某部工兵营组建制成的，并从其他部队抽调了一些翻译、通信、卫生等专业人员。这个营是一支诞生在战争年代的英雄部队，具有快速反应能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士兵大部分是专业技术能手，所有干部精通工程兵爆破、筑城、桥梁、道路等专业技术。

这支部队组建后，立即进行了应急机动、复杂条件下的野战抢修和适应性等一系列强化训练。在进行 150 公里复杂条件下的紧急拉动训练中，由 60 多辆各种类型车辆组成的车队，始终随意联络畅通，指挥自如，无一车辆掉队。赴柬前，官兵们还进行了战场救护、紧急抢修、战斗勤务、越野爬山等七大科目的训练。每天训练时间长达 10 多小时。部队还对赴柬官兵进行了《联合国宪章》、巴黎协定及外事政策、纪律和柬国情的教育。官兵们对有关规定已熟记于心。上级机关组织的考核验收表明，这支部队已完全具备在国外新环境下，尤其是在柬埔寨作业的能力。出发前总参谋长迟浩田上将等检阅了这支部队，对他们的准备工作给予高度评价。

在金边联合国权力机构总部，维持和平部队司令桑德森中将会见了中国军事工程大队大队长李金勇等，对中国官兵赴柬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表示热烈欢迎，并分配了维修机场、道路和桥梁等工程保障任务。

我军宽待俘虏政策的由来

1928 年 2 月，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茅坪就宣布了工农革命军宽待俘虏的政策。1929 年在《红军布告》中明确提出：“敌方官兵，准其投顺，以前行为，可以不问。”此后，部队俘虏兵成分增多。毛泽东在红军原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基础上，又专门增加了“不搜敌兵腰包”和“不得胡乱屙屎”两项，从此奠定了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最初的条目，并把宽待俘虏提到了纪律的高度。

1935 年 12 月召开的瓦窑堡中共政治局会议，制订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对俘政策也随之形成，即：对俘虏不杀不辱，不搜腰包，医治伤病员，生活上优待，愿留下者，分配适当工作，愿离去者，经宣传教育后，发给路费释放之。

“七·七”事变后，八路军总司令部以朱德、彭德怀的名义发布了优待俘虏的六项命令：1. 不杀敌军俘虏。2. 不取俘虏财物，唯军用品应没收之。3. 医治敌军伤兵。4. 在何能情况下，将俘虏放回，并给路费。5. 愿在我部队服务者，给予适当工作。6. 不干涉俘虏的宗教信仰。之后，中央军委发出《中央军委关于俘虏敌伪纪律的指示》，中央书记处发出《中央关于瓦解敌军工作的指示》、八路军总政治部发出《政治部关于对日俘虏工作的指示》，使我党我军的对俘政策不断完善和发展。

红军长征的几个数字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被迫于1934年10月从闽西和赣南出发开始长征，至1935年10月，历时1年多，突破10个地方军阀的包围，经过11个省，爬过18条山脉，渡过24条河流，攻占62座城市，作战380多次。

红军长征途中，平均每天要打1次遭遇战，要走74华里。在路上368天的时间里，15天用于打大决战，18天用于夜行军，休息了44天，白天行军235天。连续行军二万五千里，到陕北后红军总载已不到3万人。

百万雄师渡江战线究竟有多长

百万雄师渡江战线系指湖口至江阴间长达500余公里的长江防线。

淮海战役后，国民党反动派一面玩弄“和平”阴谋，争取喘息时间；一面积极部署江防，企图凭借长江天险，阻止人民解放军南进。国民党政府的长江防线自宜昌至上海1800多公里。全线分为两段，九江以西为西段，湖口以东为东段。1949年4月21日晨开始，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百万雄师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长达500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敌长江防线完全崩溃，国民党首都南京于4月23日解放，宣告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这段战线亦称千里江防（华里）。在千里江防线上，人民解放军组成东、西中、三个集团。东集团主力在张黄港至三江营实施度江，中集团在裕溪口至枞阳间渡江，西集团在枞阳至望江间渡江。渡江战役还应包括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及中原军区部队在西集团指挥下于5月15日由鄂东蕲春、黄冈地区胜利地进行的渡江作战。

我军最早获得军衔的人

众所周知，我军首次实行军衔制是在1955年10月。然而，早此十年，毛泽东主席就曾分别授予6位同志以将、校军衔，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1945年，苏联红军挥师进入我国东北，对日作战，与中国军民一道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是年9月，驻东北苏军派员飞赴延安，要求我党中央迅速派负责干部去沈阳，协调苏军与我方的行动。9月16日，党中央研究决定由彭真、陈云、叶季壮、伍修权、段子俊、莫春和六位同志担此重任。考虑到苏方有军衔，当时，苏军驻东北的负责人是大将和中将军衔，伍修权少将军衔，段子俊、莫春和上校军衔，并用中俄两种文字写下了任命书。发生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这次授衔活动证明，彭真、陈云等六位同志是最早获得我军军衔的人。

文革前我军授衔的将帅点滴谈

1955至1965年期间，我军授衔的元帅10位、大将10位、上将57位，中将133位、少将1359位。其中：

1. 女性一位，即李贞（少将）。
2. 外国人一位，即洪水（越南河内人，少将）。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在外国军队工作，之后回国授得军衔的一位，即唐铎（少将）。

4. 解放战争时期参加起义的人员 14 位。上将 3 位：陈明仁、陶峙岳、董其武。中将 3 位：孔从洲、韩练成、曾泽生。少将 8 位：王启明、牛化东、邓兆祥、刘善本、张世珍、林遵、廖运周、魏镇。

5. 少数民族 34 人。上将 2 人：乌兰夫（蒙古族）、韦国清（壮族）。中将 8 人：赛福鼎·艾则孜（维吾尔族）、阿沛·阿旺晋美（藏族）、朵噶·彭饶措杰（藏族）、廖汉生（土家族）、万毅（满族）、冼恒汉（壮族）、韦杰（壮族）、覃健（壮族）。少将 24 人：韦祖珍（壮族）、卢绍武（壮族）、吴西（壮族）、黄惠良（壮族）、覃士冕（壮族）、覃国翰（壮族）、朱鹤云（壮族）、索立波（蒙古族）、孔飞（蒙古族）、廷懋（蒙古族）、吴涛（蒙古族）、曹达诺夫·扎依尔（维吾尔族）、习习提伊敏·伊敏诺夫（维吾尔族）、马尔果夫·伊斯哈科夫（维吾尔族）、祖农·太也夫（维吾尔族）、桑颇·才旺人增（藏族）、凯墨·索南旺堆（藏族）、黄正清（藏族）、赵承金（满族）、郭持城（满族）、白志文（满族）、刘世昌（回族）、刘瑞方（回族）、彭飞（土家族）。

6. 元帅中年龄最大的是朱德，1955 年授衔时 69 岁；年龄最小的是林彪，1955 年授衔时 49 岁。大将年龄最大的是张支逸，授衔时 63 岁；年纪最小的是许光达，授衔时 47 岁。上将年龄最大的是陶峙岳，授衔时 63 岁；年龄最小的是肖华，授衔时 39 岁。中将年龄最大的是傅连璋，授衔时 61 岁；年龄最小的是刘西元、张池明、谢有法，授衔时都是 38 岁。少将年龄最大的是史可全，授衔时 63 岁；年龄最小的是吴忠，授衔时 34 岁。

人民军队的第一批女兵

“八一”南昌起义队伍中有一支 30 人的女兵队伍，她们是人民军队里的第一批女兵。这支女兵队伍大部分是武汉军校的学生，少数是何香凝办的妇女训练班的学员。其中有彭漪兰、彭授华（现名彭文）、胡毓秀、杨庆兰、王鸣皋、谭勤先、朱觉吾等等。她们是在南昌起义结束后参加部分，其中一部分是在起义部队准备南下广东时加入的，一部分是在起义军撤离南昌后参加的。1927 年 8 月 5 日，起义军离开南昌，向赣东方向进发，除彭漪兰等 3 人分配在参谋团外，其他 27 人分配在第 9 军、第 11 军和第 20 军等担任宣传或救护工作。

会昌战斗打响时，几名身强力壮的女兵被分配到前线抢救伤员，其余的人分配到临时医院担任救护工作。由于环境艰苦，女兵中生病的越来越多。后来，她们便被动员离开了部队，有的去了武汉，有的回北方从事地下工作。

红军的第一架飞机

红军的第一架飞机名叫“列宁号”。

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1930 年 3 月 16 日，有一架国民党双翼飞机由于迷失方向降落于河滩，当地军民立即生俘驾驶员龙文光，并拆除了飞机的机翼。次年春，在莫斯科航空学校学习过的钱线钩分配来根据地工作。龙文光经过教育也愿意为红军服务。于是，上级决定把这架飞机重新装配起来，并

命名为“列宁号”。同年7月初，“列宁号”首次起飞，到固始县撒传单：11月，又配合红军攻打黄安。它挂上迫击炮弹作为轰炸机盘旋于黄安城上空，守敌竟毫无戒备。只听得“轰！轰！”两声，炮弹落地爆炸。这下敌人可吓破了胆，第四天就弃城而逃。“列宁号”首战告捷。

到第四次反“围剿”时，红军不得不把“列宁号”拆卸开来埋藏在大别山偏僻的山沟里。

我国第一代反坦克火箭筒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我军与装备精良的美军作战，如何打坦克是一个困难问题。那时我军仅有数量不多的，在解放战争时期缴获的老式六毫米火箭筒。主要靠集束手榴弹、炸药包和爆破筒在近距离内于美坦克格斗，不能适应战斗需要。为此，军工部门组织力量，在较短时间内仿制了五一式九毫米火箭筒，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

五一式九毫米火箭筒是一种携带方便、使用灵便的轻型反坦克火箭筒。它采用圆管发射筒，用干电池作发火电源，配有反射式光学瞄准镜，全重10公斤，口径为90毫米，全长1.45米；以肩射为主，把两脚架支在地面上可进行卧姿射击；火箭筒明弹初速为106米/秒，最大射程达785米，战斗中采用空心装药，能击穿120毫米的装甲，在100至250米距离内打坦克最有效。

五一式九毫米火箭筒于1951年投产，首批火箭筒于1952年初运到前线。许多步兵连都组建了火箭筒班，每班装备9具火箭筒，大大加强了步兵的反坦克能力，在许多战斗中，屡建战功。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共击毁击伤美军坦克1247辆，后期战争用火箭筒摧毁的占很大比例。五一式九毫米火箭筒早已退役，然而，作为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就自行制造出这种反坦克武器，它的良好战斗性能，至今仍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国的核试验

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造出了用于自卫的原子弹、氢弹，中程、远程导弹等战略武器。

1964年10月16日，在我国西部地区成功地爆炸了一颗原子弹，这是我国进行的第一次核试验。它揭开了我国国防现代化的崭新一页。

1965年5月14日，在西部地区上空又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成功地进行了第二次核试验。

1966年5月9日，在西部地区上空，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含有热核材料的核爆炸。

1966年10月27日，进行了导弹核武器的试验。导弹飞行正常，核弹头在预定的距离，精确地命中目标，实现核爆炸。

1966年12月28日，在西部地区又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核爆炸。

1967年6月17日，经过前述两年零8个月时间进行的5次核试验之后，在西部地区上空，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

1968年12月27日，在西部地区上空又爆炸了一颗氢弹，成功地进行了

一次新的热核试验。

1969年9月23日，成功地进行了首次地下核试验。接着于9月29日，在西部地区上空进行了一次氢弹爆炸。

1970年10月14日，进行的一次核试验，显示出正在研究一种用于洲际弹道导弹的热核（氢弹）弹头。

1971年11月18日、1972年1月7日和3月，先后进行三次新的核试验。

1973年6月27日，在西部地区上空，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氢弹试验。这是300吨级的第5次爆炸，是一次体积更小的核装量爆炸。

1974年6月17日，在西部地区上空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核试验。

1975年10月27日，又一次进行地下核试题。

1976年1月23日、9月26日，分别成功地进行了新的核试验。接着于10月17日，成功地进行了第三次地下核试验。11月17日又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氢弹试验。这是在这一年中进行的第四次核试验。

1977年9月17日，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核试验，爆炸力为2万吨，规模很大，在导弹弹头小型化和研究运载手段方面，已经取得了新进展。

到1978年3月15日所进行的一次新的核试验为止，我国共进行了23次核试验。

我们进行必要而有限制的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为了对付超级大国的核威胁，消灭核武器。我们一再声明：中国绝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我们将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而共同奋斗。

第三章 军事名家智谋

卢汉智救共产党

解放前夕，云南省实力派将领卢汉见国民党大势已去，暗中与共产党地下组织建立秘密联系，共商和平解放云南大计。

蒋介石此时对卢汉也有所怀疑，但因证据不足，不能轻易对一个地方实力派人物下手。他决定亲赴云南考验一下卢汉。

这天，蒋介石见到卢汉后便大声斥责起来：“你们云南共匪猖獗，人心不稳，那些学生整天要民主呀要自由呀，我看都是共产党的煽动，你必须立即给我摧毁云南的共产党地下组织。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

“没有困难，我一定依照总裁的吩咐，尽快将云南的共产党一网打尽。”卢汉回答得很干脆。

在告别蒋介石回家的路上，卢汉心想：看来这次不做点姿态是不行了。怎么样才能既应付了老蒋，同时又不使共产党地下组织受损失呢？经过深思熟虑，卢汉终于有了一条妙计。

卢汉大张旗鼓地解散并查封的省议会，却迟迟不进行搜捕。解散和查封省议会的举动，立即惊动了共产党和左派人士，他们马上秘密转移。等卢汉下令进行搜捕时，早已不见了共产党的踪影。蒋介石没有看出什么破绽，只好作罢。

卢汉在这里采用的正是打草惊蛇之计。他运用此计可谓妙不可言，既消除了老蒋对自己的怀疑，又保住了云南共产党的地下组织。

聂荣臻横扫东洋狂魔

日寇侵华后，打着“大东亚共荣圈”的旗号对我国进行肆无忌惮的扫荡。掠夺财富，侮辱百姓，而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如瓮中鳖龟缩在他的老巢，不敢轻举妄动。然而在1939年11月7日，我国现代历史名将聂荣臻秦元帅在涞源县给侵华的日寇以沉重的打击。

1939年10月30日，日军阿部规秀中将派十村大佐率领1000多日伪军进驻涞源，有向我四分区的银坊镇、走马驿、灰堡地区扫荡的迹象。其主力两个步兵中队、一个炮兵中队和一支600余人的伪军队伍，由十村亲自指挥，经龙虎村、白石口、鼻子岭向银坊镇地区逼进，企图消灭在这一带活动的我抗日军队。

当时，聂荣臻为晋察冀军区司令员。他对粉碎日寇的秋季“扫荡”早已作了充分准备，官兵个个摩拳擦掌，为保卫祖国的河山，狠狠教训来犯的敌人，在古战场上奏出团结抗战的新凯歌。涞源也是八路进入敌后最先解放的一个县城，经过宣传组织工作，群众抗日的热情很高。而且从涞源到银坊只有一条大路。尤其从白石口到雁宿岩一段，中间是条蜿蜒曲折、偏僻狭窄的河套，两面群山耸立，更便于伏击敌人。根据这些条件，晋察冀军区四分区怀念员杨成武等思谋采用伏击战术，集中兵力，歼灭向白石口至银坊一线进犯的敌人，给阿部规秀一个“见面礼”。伏击地点选择在雁宿岩附近，在这里安排食饵钓鱼。11月3日清晨，白石口的敌人在八路军派出的一支游击队的引诱下向雁宿岩追击而来，这时，由聂荣臻批准的作战方案已按计划进行。

八路军主力一、二、三团，一个团埋伏在东山，一个团埋伏在西山，一个团隐伏在山沟、岭坎，准备截断敌人的退路。清晨，太阳刚刚露出头，山山岭岭就显得明亮了。雁宿岩两岸的杂树野草，在晨风中轻轻摇动。一只蓝山站在悬崖畔的一棵小榆树上，尾巴一翘一翘地噪叫，像是在引诱日寇，说：“平静，平静，没有危险。”实际呢？它站的那棵树下，就有八路军战士趴伏着，复仇的枪口正对着那干涸的河套。

7点多，十村大佐领着600多日伪军进了雁宿岩伏击圈。

“砰！”

枪声划破了清晨的寂静。接着千枪齐发，射向日伪军，“呼！”扔出的手榴弹带着风声，“轰！”在敌人的脚下炸响了。二、三团从东、西两面扑向敌人，一团从敌人背后发起攻击，引诱敌人的游击队也掉转枪口，朝敌人劈头盖脸地打过来。日寇的武士道精神不论多么顽固，但在这突然打击下也惊慌失措，尤其是那些伪军，更是浑身发抖，直往稍微大一点的石头后面躲，有时两个伪军为争一个理想的藏身处，自己便同自己打起来了。经过一天激战，包括十村大佐在内的日伪军死的死，伤的伤，降的降，一个也没跑掉。

阿部规秀听到十村一部全部被歼的消息，气得“呀希”、“呀希”乱叫，不过，他是日本“名战术家”，待稍稍平静后，知道十村之死，就殁在中国八路军的伏击之计。在他痛惜十村死亡的同时，又埋怨十村太无谋略，怎么就看不出八路游击队是诱敌入伏呢？他决定亲自出马，“八路，八路，你来引诱我试试。”

11月4日，他带领张家口1000多人，乘卡车直驰涞源，对八路军占领地区实行扫荡。“八路，你不是在雁宿岩设埋伏赢了十村么？这次我让你在哪里占了便宜就栽在哪里。”阿部设谋企图引诱八路军再次在雁宿岩设伏，将八路军主力消灭在雁宿岩，然后扑向银坊，再西起走马驿，东进黄土岭，寨坨一带……这似乎可以用中国一句俗语：“哪儿跌倒，从哪爬起来”。阿部觉得，这样才能挽回“皇军”的体面。

试想，这不是做梦娶媳妇，尽想好事吗？你让八路军在雁宿岩再设埋伏，八路军真就在那里再设埋伏，让你打个反埋伏？聂荣臻看穿了阿部的阴谋，便指挥分区以小部兵力在白石口一带迎击敌人，把敌人引向银坊，使其扑空。随后，再用一支游击队在银坊北边出击，牵敌人东进，等到敌人到了黄土岭一带，再集中主力把它包围歼灭。这次，除一、二、三团外，又增加了二十五团，炮兵营，并命令一二师特务团从神南北上，一起参加战斗。

11月5日，1000多敌人从龙虎村向白石口前进。八路军游击队缠住敌人，打了又跑，跑后又来打，敌人打又打不着，追又追不上，阿部“战术家”倒忘了八路军使用的是“以怒致敌”的谋略，这谋略的核心是激怒敌人将帅，使其失去理智，出现错误。他先暴跳如雷，急于寻找八路军主力决战，次日挥师东进。八路军无影无踪，阿部只好在黄土岭、司各庄一带宿营，这时八路军一团和二十五团在寨索、煤斗店一带集结，卡住了敌人退路。三团和特务团占领了黄土岭及上庄子以南高山。二团绕到黄土岭西北，尾随敌人，形成了包围圈。阿部还蒙在鼓里，7日拂晓，他率队东进，中午到达上庄子，先头部队进到寨索附近，尾巴才离黄土岭，成了一条望不到首尾的长蛇。这时，八路军一团、二十五团迎头杀出，三团、特务团和二团从西、南、北三面合击过来，将敌人压缩在上庄子附近约两公里长，百十米宽的山沟里，阿部一看地势不利，心头掠过一丝恐慌，但想到自己装备精良，尤可抵挡，便向寨

索冲击，遭到迎头痛击后，又掉头向黄土岭突围，企图回到涞源。但八路军三团，特务团和二团早把口袋扎住，逼得敌人步步后撤，这一下，敌人如一沟蚂蚁，互相挤碰，乱成一团。八路军炮兵营立即向沟里集中射击。“皇军”成了“蝗群”，在硝烟、火海里挣扎，阿部规秀也在炮火中一命呜呼了。

阿部一死，“群蝗”无首，更加混乱。

8日早晨，飞来5架敌机，投下几个指挥官，企图扭转残局。但到8日下午，敌人主力900多人毙命。这时，敌人援兵分五路杀来，企图打个反包围。八路军立即主动撤离战场，转到外线，继续打击敌人，11月底，合围之敌全线溃退。

聂荣臻巧施韬略，不但葬送了日本的“名将之花”，更取得反“扫荡”的彻底胜利。

徐海东用兵如神 阎锡山疲惫不堪

徐海东，1900年6月17日生于湖北省黄陂县徐家窑（今属大司县），192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长，骁勇善战被誉为“徐老虎”，1932年后任军长、军团长，抗日战争中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先后9次负伤。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徐海东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立下不朽功勋，他善于独立作战，其战术以“先疲后打”而著称，这一战法，是对“以逸待劳”的灵活运用。

1935年4月，徐海东率领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南，蒋介石调集41个团的兵力入陕，由杨虎城统一指挥，围剿红二十五军。

敌人兵力强大，红二十五军只有2个步兵团，1个手枪团，兵力不满3000人。面对强大的敌人，徐海东制定“诱敌深入，先疲后打”的作战方针，先把敌人拖疲，然后再一一击破。

6月初，徐海东率军北上，然后向东，再向南，拖着敌人，搞武装大游行，今天70里，明天80里，离敌人不远不近。

6月25日夜，徐海东突然带领部队南下，一夜疾行130余里，一举攻占了敌四十四师的鄂豫狭边界的战略要地和补给站——荆紫关，全歼守敌200多人，缴获了大量的军用物资，使军队得以物资补充。

得到补充的红二十五军进行休整，此时是兵强马壮，精力旺盛。敌人得知荆紫关被攻克，就急忙调67军的3个师、第四十四师和西北军警一旅等向荆紫关压了过来。

敌人越来越近，红军早已养精蓄锐，徐海东率军与敌人保持适当距离，拖着敌人进入崇山峻岭，继续西进。

西北军的警一旅，一向骄横，被红二十五军拖了20多天，早已疲惫不堪，精疲力尽，毫无斗志。

徐海东命我主力部队，在袁家沟埋伏待敌。7月2日拂晓，警一旅进入我军伏击圈，遭到红军的伏击，敌人毫无防备，乱作一团，溃不成军，1800余人全部被歼，黄埔军校毕业的旅长唐嗣桐当了俘虏。

警一旅被歼，其余的部队也都疲惫不堪，难以再战，这次“围剿”以蒋介石的失败而破产。

1936年2月，徐海东率领红十五军团，渡过黄河，来到山西，吸引太原敌军，调动敌人。徐海东亲自率领先头部队的1个骑兵连，飞驰到太原近郊

的晋祠活动。

阎锡山是个老奸巨猾的军阀，他深知徐海东非等闲之辈，急忙调动主力10多个团，向红十五军团扑来。阎锡山还悬赏：“凡击毙徐海东者，赏洋5万元”。

面对强大的敌军，徐海东还是采用老办法：“先疲后打”。他带领部队北上，拖着敌人的十几个团，从晋中走到晋北，有时敌人跟不上，“掉了”，我军就休息一下，等敌人跟上后，再继续前进，牵着阎锡山的牛鼻子，在山西的大山峻岭中绕圈子，把敌人拖得精疲力尽，然后，又突然掉头南下，将大部分敌人甩掉，仅将少数尾随的敌人诱到白文镇以南地区。

红十五军团早已布下天罗地网，在徐海东的指挥下，突然还击，把晋军的2个步兵团和2个炮兵连全部歼灭。

将强敌转化为弱敌，就要善于疲惫敌人，徐海东拖着敌人，搞武装大游行，以小股部队和游击队，不断地袭击敌人，使敌军吃不好饭，睡不好觉，行不好军，一天24小时紧张，时刻处于危险之中，久而久之，势必消耗其精力，减弱其斗志。我军战士善于跋山涉水，敌人却在崇山峻岭面前消失锐气。与此同时，我军选定预设战场，伏击疲惫了的敌人，一口吃一路。敌人暴露在开阔地，我军隐藏在西侧有利的地形上，发挥近战火力，歼敌于混乱之中，我军以极小的伤亡，取得巨大的战果。

在我军高级指挥员中，徐海东是一员十分出色的战将。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在其著名的《西行漫记》中，专有一节《红色窑工徐海东》，他在文章中写道：

“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中，恐怕没有人能比徐海东更加大名鼎鼎的了，也肯定没有人能比他更加神秘的了。除了他曾经在湖北一个窑厂做过工，外界对他很少了解。蒋介石把他称为文明的大害……”

他一生经历100多次战斗，9次负伤，全身留有17处伤痕。

毛泽东称徐海东是“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红军的领袖，群众的领袖”、“最好的共产党员”、“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朱老总伪装骗敌巧取宜章

朱德(1886年12月~1976年7月6日)是中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党、国家和军队的卓越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字玉阶，四川仪陇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并领导八一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第九军副军长。1928年4月率队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总司令，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中华苏维埃军事委员会主席。1934年10月参加长征。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总司令，深入敌后，与日军作战。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与毛泽东一起指挥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在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常委委员会委员长。

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闻名中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同志成功地伪装骗敌军，取得了宜章城。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南昌起义，建立了第一支工农武装。

1928年1月，朱德和陈毅带领一部分起义军进入湖南，部队在宜章县蟒山洞驻扎下来。

朱老总挑选了200多名战士，穿上国民党军队服装，大摇大摆地向宜章城开去。先头部队进城后，按照朱老总的计策，向各方地主豪绅发出请帖，说是等大部队进城后，要宴请他们，共同商量大事。

第二天，朱老总带领大部队进入宜章城，那些官吏地主绅士都来欢迎，他们看到有这么强大的“正规军”来保护他们，都非常高兴。

在宴会上，朱老总问敌县长：“你们这里有没有农民运动呀！”

敌县长恭恭敬敬地答道：“怎么没有呢？从前年到现在一直没断过，闹得我们真是寝卧不宁呀！”

朱老总点着头说：“哦，这么说你们受惊了！”

敌县长抱抱拳说：“哪里，哪里，不过，自从许克祥师长在长沙狠狠杀了一批共产党后，这些穷鬼也老实多了，我们团防局也出了不力。”

这时团防局的头子大胖子赶紧说：“我们团防局只有400多人，没啥贡献，惭愧！惭愧！”

胖子急忙说：“我们关了一批人，杀了一批人，还活埋了一批，对付这些穷光蛋，我们有的是办法！”

朱老总强压怒火，又问敌县长：“本县在镇压共产党和暴民中，哪些人功劳最大？”

敌县长想了想说：“恐怕要数杨孝斌、黄得珍、刘秉钧、肖斯若这四位。”

其他的人以为要领赏急忙张三举李四、李四举五王，又举了一批“有功之臣”来。有一个老头说：“依我看来，在座的各位乡绅，都是有功之臣！”这么一说，大家纷纷赞成，个个喜笑颜开。

朱老总说：“请问各位，杀了这么多老百姓，不怕有朝一日，人民找你们算帐吗？”

这句话，就象晴天霹雳，把一张张喝红的醉脸，顿时吓得煞白。接着，朱老总站起来，举着酒杯厉声说：“好啊，让我劝各位一杯酒，祝贺你们为非作歹的日子到头了。”说罢，独自一饮而尽。四周的战士们看到行动暗号，立刻冲上来把一支支冷嗖嗖的枪管顶在这群坏蛋的胸上。

就这样，朱老总的部队占领了宜章城。

朱老总这个巧计的实施具有一定的基础。道理是情况明了，中共宜章县委负责人胡世俭、陈东日等，听朱老总的部队到了蟒山洞，主动前来联系。朱德和陈毅一起同他们多次详谈，对宜章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知道宜章没有国民党的正规军，只有一个四五百人的反动民团，对粤北方面没有电讯联络，这为创造奇袭提供了有利条件。

进城的先头部队以胡少海为先导，而胡少海是宜章的富户，父兄都是当地闻名的豪绅。他本人曾在程潜的部队里当过营长，当地官绅都知道他。所以胡少海带队伍进宜章城，当地官绅深信不疑。

此外，还派人给宜章县政府送去一封信，说是十六军一四团奉命移防宜章，以保桑梓维护治安。当时旧历年关将近，湖南各地农民正在酝酿年关暴动。许多官商大户成天提心吊胆过日子、听说有一支正规部队开到宜章驻

防，犹如久旱逢甘雨，他们十分热情，先头部队和随后跟进的大部队进城时，县长杨孝斌亲自带着官员出城迎接。

朱老总的妙计之所以取得成功，在于巧妙安排，丝丝入扣，毫无破绽。

罗荣桓妙计除奸

1942年，侵华日军驻山东济南高级特务机关为刺探新四军的情报，采取释放俘虏的办法，派奸细打入抗日根据地，进行谍报活动。具体做法是：让看守故作疏忽以便使俘虏三五成群地逃跑。有时放跑的纯粹是新四军被俘人员，有时放跑的是伪装成被俘人员的奸细。

这一次，新四军侦讯科又审查了一批由敌占区逃回来的被俘人员。经严格审查，最终有五个人来路不明。在侦讯科同志的耐心说服教育下，五个人中有两个人承认自己新当了特务，而另外三个人坚决不承认自己是特务。其实，侦讯科已掌握了这三个人当特务的材料，其中一个外号叫“催命鬼”的人原来就当过国民党特务。

侦讯科科长找到罗荣桓汇报了此事，并请示如何处置这5个人。罗荣桓先让科长谈自己的看法。科长说：“把那两个主动坦白的，按政策放了：‘催命鬼’等三人顽固不化，枪毙算了！”罗荣桓慢慢点上一支烟，思考了片刻，然后对科长说：“我看把这五个人全部放了。”科长感到迷惑不解。罗荣桓把自己的妙计和盘托出，科长连连称妙。

这天下午，侦讯科的同志向两个新当的特务讲了政策，并布置了四条任务。之后，将“催命鬼”等三人押来，也讲了政策，但没有布置任务。最后派人把这五个人分别送出根据地。

这五个人一回敌占区，就被日本的高级特务机关关押起来。他们开始都说是逃跑出来的，后来受不了皮肉之苦，两个新当的特务先招供，并说有任务在身。当问到“催命鬼”等三人时，只说优待三天，没布置任务。日本特务头子起了疑心：为什么两个人有任务，而另外三个人没有？不承认有任务的这三个人一定隐瞒了什么。于是，对“催命鬼”等三人用酷刑，这三个人胡编乱供，更加驴唇不对马嘴，引起了更大的怀疑。最后日本人决定把“催命鬼”等三人枪毙，另外两个也被关进集中营。

刘少奇巧使空棺计

1941年盛夏，担任新四军政委的刘少奇带着通讯员外出开会。这时，日本鬼子派出的特务发现了刘少奇的行踪。为此，大批日伪军倾巢出动，扬言要活捉刘少奇。

一天，刘少奇来到建阳县马庄，敲响一家农户的屋门。开门的中年汉子仔细查了刘少奇一番惊喜地说：“你是胡服（刘少奇的化名）同志吗？”刘少奇也认出了对方：“你是马玉甫！”原来，刘少奇在盐城工作时，曾与抗日民主政府的代表马玉甫有过一面之交。

两个人正说着，远处传来杂乱的脚步声和一阵汪汪的狗叫声。显然，日伪军进庄了。刘少奇说：“老马，咱们要尽快想个办法把我身边的文件藏好，现在庄里有没有空着的棺材？”马玉甫一时没弄明白。刘少奇继续解释说：“是这样！把文件装进棺材里，不就安全了吗？”马玉甫受到启发连忙说：

“再把棺材封好，贴上灵柩纸，我们穿上教衣装作发丧，肯定能脱身。”刘少奇说：“对！来个空棺计！”

于是，大家忙活起来，抬棺材的抬棺材，借孝衣的借孝衣，不久一支“送葬”队伍就伪装成了。刘少奇等穿着孝衣，把棺材抬上了船。船刚要离岸，一队日伪军追了过去，命令船靠岸检查。刘少从容地说：“家里死了人，有什么检查的。棺材里的人是得霍乱病死的，会传染别人的。”说完，装出一副要呕吐的样子。日伪军一听说是得霍乱死的，连忙手捂鼻子，命令赶快开船。

就这样，刘少奇巧施“空棺计”，金蝉脱壳，迷惑敌人，平安地脱离了险境。

邓小平当机立断 我军反客为主

1947年6月，我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在敌人心里插上一把尖刀。我军挺进大别山后，同东北、华北、西北、华东等战略区的反攻和进攻相配合，形成了对敌人的全国规模的巨大攻势。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由内线作战转为外线作战，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扭转了整个战场形势，为夺取全国胜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大别山是敌人战略上最敏感而又最薄弱的地区，攻占大别山，就可以东慑南京，西逼武汉，瞰制中原。我军攻占大别山后，蒋介石必然调动其进攻山东、陕北的部队同我军争夺这块战略要地，这就是“攻其所必救也”。

刘伯承站在黄河边上，看着水流湍急的黄河水，对邓小平政委说：“蒋介石利用黄河从陕北到山东所构成的“乙”字形天然形势，把主力集中于陕北、山东两翼，实施进攻，终于在8月末先后进入大别山区。

我军挺进大别山，把战场引进敌战区，吸引了其他战场的敌人，达到了预期的战略目的。

毛泽东说：“我刘邓、陈粟、陈谢三路野战军……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歼灭了大量敌人，调动和吸引了蒋南线全部兵力一百六十多个旅中约九十个旅左右于自己周围，使蒋军处于被动地位，起了决定性的战略作用。”

肖劲光智胜白崇禧

1949年9月，长沙和平解放。

国民党军队中人称小诸葛的白崇禧指挥下的5个兵团，11个军、26个师，共20多万人，重点布防衡（阳）宝（庆）公路两侧和粤汉公路衡山至郴州一线，南与广东的余汉谋集团组成“湘粤联合防线”，西与湘鄂西之宋希濂集团呼应，妄图阻止我解放大军向华南和西南进军。

我第四野战军采取战略迂回包围的作战方针，兵分三路大军。

东路，陈赓兵团，挺进广东，向广西迂回。

西路，程子华兵团，首先突破藏江地区防线，然后向广西进军，断敌退路。

中路。肖劲光兵团，担负正面突击任务。

9月2日16时，三路大军一齐向敌发起进攻。

敌71军阵地被中路军突破后，白崇禧改变战略部署，调了4个军于衡宝

公路上，转守为攻，企图夹击我 40 军。

肖劲光指挥中路大军第 45 军之 135 师果断地从敌人的间隙中穿插过来，连续急行军 24 小时，前进 80 公里，孤军楔入敌后，进行到灵官殿地区。这一行动像一把尖刀直插敌人心脏，威胁着敌人的整个部署。

白崇禧大为恐慌，连忙调集 4 个师，分别向我军 135 师各团阵地进行猛烈攻击。我 135 师迅速占领山头隘口与敌展开激战，将敌第 7 军之第 171、172、176、138 共 4 个师退路截断，我第 41 军主力迂回黄土铺，切断了敌西北退路。我第 40 军从东迂回上去，把从东面突围南逃的敌人截住。我正面部队紧追不舍，将这 4 个师敌人围在其中，四面合围，全歼敌主力 4 个师，生俘敌第 7 军副军长凌方上，参谋长邓达芝，第 171 师师长张瑞生，第 172 师师长刘月监，第 176 师师长李祖霖，消灭了白崇禧主力之中的主力，为后来进军广西，全歼白崇禧集团创造了有利条件。

陈云急中生智摆脱密探

1927 年 4 月 12 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各地的共产党组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当时，陈云在青浦地区领导农民运动也遭到严重挫折。为保存革命力量，党组织决定陈云和另外两名地下党员暂时离开那里。他们三人一上路，就发现两个鬼鬼祟祟的家伙跟在后面。当他们来到枫泾镇时，那两个家伙还尾随着。陈云断定他俩是敌人的密探，于是思量着甩掉的办法。

走着走着，陈云发现前面有一个饭店，马上有了主意。三人进饭店后刚刚坐下，两个密探也跟着进来了。陈云佯装不知，与同桌的食客拉起家常，不时发出朗朗的笑声。他们三人一边大吃大嚼，一边称赞菜肴的味道，在一旁的两个密探早已饥肠辘辘，不时地咽着口水。这时，陈云善意地对他们扬了扬手说：“兄弟，看你们一定很饿了，一块吃点吧！”两个密探心想：不吃白不吃，于是凑过来狼吞虎咽大吃起来。陈云用眼神暗示那两个地下党员先走，他们会意出去了，好一会儿也没回来。陈云装作不耐烦的样子说：“这两位老兄老毛病就是改不池，到哪里看热闹了，菜都快凉了。”说完，他站起身对那两个吃得正香的家伙说：“我去找他们，请你们帮我照看一下我的东西，我马上就回来。”

陈云走后，两个密探左等不来，右等也不来，最后终于醒悟过来：“不好！我们中计了，他们一定逃走了！”他俩忙打开陈云留下的箱子，除了一捆《申报》和几块石片外，就是一张纸，上面写着：“苦海无边，回头是岸，顽固到底，死路一条。”两个密探气得把纸条撕得粉碎，懊悔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像泄了气的皮球瘫坐在凳子上。

陈云急中生智，想出金蝉脱壳的办法巧妙地甩掉敌人密探的跟踪。在不利的条件下，妙计取胜，变被动为主动，显示出高超的智谋和非凡的胆略。

毛泽东高瞻远瞩

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是 1958 年 8 月 23 日开始的，史称“8·23”炮战，这是一场局部的军事斗争，是一场军事、政治、外交的全面斗争，双方你来我往斗智斗勇，环环相扣，令人惊心动魄。

1958年7月27日，叶飞收到用电报转来的毛主席至彭德怀、黄克诚的信。毛主席在信中说：对炮击金门“暂时不打”。叶飞当即复电表示，要把准备工作做得再充分一些。此后的一个月中，空军进入连城主汕头机场，后又转到龙田机场。原志愿军空军风智调任福州军区空军司令员。海军舰队和岸炮部队也进入了福建沿海。炮兵调来了三个师，还有一个坦克团。

到了8月初，地面炮兵全部进入阵地。海军130岸炮部署在厦门的角尾。我炮兵阵地从角尾到厦门、大磴小磴，到泉州的围头，呈半圆形长达30多公里，大金门、小金门及所有港口海面都在我人民解放军炮兵的火力控制之内。炮兵、空军和海军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只等待北京的命令了。

8月21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召见了叶飞，当时彭老总和林彪也在座。当毛主席听完了叶飞的汇报之后，突然问他：“你用这么多炮打，会不会把美国人也打死了？”

叶飞想了想，当时在国民党军队中，美国顾问一直配到了营一级。“唉呀，那是打得到的啊！”

毛主席考虑了一下说：“你们能不能不打美国人？”

叶飞说：“主席，那是不可避免的啊！”

毛主席听了之后，再也没有说什么，只说一句：“大家休息吧。”

到了第二天再开会的时候，毛主席对叶飞说：“就照你们的计划打吧！”

第一炮火过后，整个金门全部笼罩在一片硝烟之中。当时胡璉和他的美国顾问刚刚走出地下指挥部。正好炮声一响，他马上缩了回去。可是防卫副司令吉文星、章杰、赵家骧身受重伤，相继死在医院里。当时，阵地上的美国顾问也被打死两人。

令人不解的是，解放军炮击金门的报告送到蒋介石的手里时，他却连连说：“好！好！好啊！”

原来50年代以来，美国借以支持蒋介石，连连提出一系列要求，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妄图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这一点蒋介石有苦说不出，只好看人家美国人的脸色行事。炮击金门之后，蒋介石便以大陆要解放台湾为由，顶住了美国要他从金门撤兵的要求，从而一下子打破美国“托管台湾”的阴谋，这可以说是蒋介石借了毛泽东的力，也可以说是毛泽东的一计。

另一连环计是，美国在中东地区大打出手，为了支持中东人民的解放斗争，毛泽东大量动用军队，做出解放台湾的样子，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一连几天睡不着觉，下令将地中海的美军第六舰队的一半舰只调到台湾海峡与第七舰队会合，这样美国在台湾海同伴就有了航空母舰7艘，重巡洋舰3艘，驱逐舰40艘，美军陆战队3800人在台湾南部登陆。这样就调动了美国正在侵略的中东的第六舰队，支持了中东人民的斗争。

8月下旬，叶飞从北戴河回到厦门。此时金门的海上补给线已经全部切断，金门守军频频向台湾告急。蒋介石请求美军护航，以保证金门的海上补给。

9月7日，美蒋航船混合组成了运输队向金门开来。美国的直接卷入使情况一下子复杂了。叶立刻给毛主席打电话，报告情况。

毛主席在电话里说：“炮还是要打的，照打不误，但是不要打美舰，只打台舰。”

“美舰要是开炮还击怎么办？”

“没有命令也不准还击。”

叶飞把毛主席的命令下达到阵地上，很多指挥员都很吃惊，以为命令下错了，美舰就在眼皮下面，还能不打？

叶飞命令前线指挥员要坚决按中央的命令执行。

9月7日12时，美台舰队到金门科罗料港口，运输船开始卸货。毛主席下令开火。顿时炮声隆隆，炮弹纷纷向舰飞去，谁知炮声一响，美军舰丢下台舰立刻向台湾方向逃去。结果台舰被击沉三舰，击伤多艘。

事后，叶飞才明白，毛主席下达这样的命令，目的是试探一下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效力有多大？美军想在台湾海峡介入到什么程度？这样一较量，毛主席也就摸到了美国的底了。所谓美、台共同防御也是有限的，只要涉及美国自己的利益，要冒和人民解放军发生直接冲突的危险，美国是一定不会干的。

炮击从“8·23”开始，一直持续44天。下一步解放军可以登陆收复金门和马祖了。可是毛主席一直迟迟不下解放金门的命令。

前线指挥员一直等到10月6日，国防部长彭德怀发表了告金、马、台同胞书，出乎意料地提出：“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

他接着宣布：“从10月6日起，暂以七天为期停止炮击。”

又建议进行和平谈判。

台湾当局面对这一公告，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一会说，这是个大骗局，一会又说，这是新攻势前的喘息。还说这是离间中美之间的关系。

10月13日，彭德怀又向我军发布命令：“金门炮击从本日起再停两星期。”又着重指出：“收复台湾是中国人民的主权，美国、联合国都无权过问。”

10月25日，国防部长彭德怀发表了《再告台湾同胞书》提出：“中国人的事只能由中国人自己解决，一时难以解决，可以从长商议。”并宣布单日打炮，双日不打炮，“以利你们长期固守”这样金门炮击便变成了象征性的，虽然双方没有什么协议，可是心里都明白。我们对金门打炮，不打阵地和居民点，只打海滩。他们打炮也只打海滩。后来发展到过年过节停止炮击三天，让金门军民平安过节。

当时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表了三篇文章，都是毛主席亲自撰写的，这在当时也不是什么秘密。不过为什么没有解放金门，这怕也是毛主席连环计中的一环吧。除了一定的军事牵制作用外，还可以留下一个双方“对话”的渠道。成为一种新的谈判方式。

炮击金门进行了21年，毛主席做出这一决定，就可以看出，毛主席是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的，而且环环紧扣，步步争取主动。